

#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2023年5月上旬刊  
总第62期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AINT-PIERRE**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 编者语

我们很高兴向您介绍另一期《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其中包含了有关影响当今世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精辟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内容。如您所知，个人、社区和国家都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风险，而这些威胁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加。这期杂志不仅介绍了当前趋势，而且还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对如何处理非传统安全挑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强调，深受严重粮食不安全影响并需要紧急粮食和生计援助的人数正在增加。报告指出，超过 25 亿人正面临着严重的饥饿问题，经济冲击，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2022 年，58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58 亿人面临危机或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比 2021 年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3 亿人相比有所增加。

东盟各国部长举行会议，审查了第 42 届东盟首脑会议的所有准备工作，商定了将提交给高级领导人的议程和文件。越南外交部长 Bùi Thanh Sơn 提出，该地区正面临着非传统安全挑战，亟需在海洋事务、应对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和流行病等领域促进更有力、更有效的合作。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纳 - 穆罕默德敦促采取变革性行动，结束饥饿和不平等，并向会员国介绍了联合国粮食系统的第一次反思时刻。她说，我们目前的粮食系统正在使我们失望。尽管在 COVID-19 大流行病之后，人们希望改善粮食安全，但情况恰恰相反。复杂的危机加剧了已经令人担忧的极端贫困、饥饿和不平等的趋势。

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共同主持了第五届澳大利亚 -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年度会议。两国部长

重申了他们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承诺，包括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其他跨国犯罪，如毒品贩运、洗钱、打击人口贩运和人口走私，以及促进安全和正常移民。

我们支持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多元观点，以便在不同背景的读者中引发建设性的对话。不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基于实证的研究，并结合平衡的观点，这将有助于加深您对 NTS 威胁如何同时影响社会和国家的理解！我们知道，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相互关联，正因如此，我们继续应对其挑战。我们邀请您与让我们一道深入探究这些重要议题。

我们欢迎读者的反馈，并期待听到您对本期刊物的看法。

2023 年 5 月 15 日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刊物编辑部

# 目录

01 /

## 前沿研究 FRONTIER RESEARCH 11

国际安全研究中种族的平庸化：从赦免到废除 11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粮食安全和全球粮食供应链断裂：对后疫情时代构建智能化粮食供应链的思考 12

02 /

## 学者访谈 SCHOLARS INTERVIEW 13

Tobías Belgrano: 阿根廷与丝绸之路协议 13

James M. Dorsey: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的改善：紧张局势的缓解还是根本性问题的解决？ 16

03 /

## 研究员专栏 RESEARCH COLUMN 18

章雅狄 余潇枫：和合治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建构 18

余潇枫：人类安全算法“升级”：战争—竞争—竞合—和合 39

# 学术委员会



余潇枫

主席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魏志江

委员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冯长根

委员

科技安全专家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



余翔

委员

知识产权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管理学博士



徐晓林

委员

非传统安全治理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

组专家



黄建钢

委员

海洋安全专家

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

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CZZC)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斌

委员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长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主任

广东印太和平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 顾问团队



**Ritu Agarwal**  
经济安全专家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谌新民**  
人口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Keven E. Bermudez**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好邻居”组织创始人  
医学博士



**成锡忠**  
海外利益保护专家  
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特聘教授  
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高剑波**  
信息安全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  
UCLA 电子信息工程博士



**Chris Hadley**  
社会安全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胡靖**  
粮食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何一平**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原执行会长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原副主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Mohd. Aminul Karim**  
区域安全合作专家  
孟加拉国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会员  
印度达卡大学博士



**李晓峰**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与博士后导师  
复旦大学博士后



**刘国柱**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林坚**  
文化安全专家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Yannis A. Phillis**  
产业安全专家  
克里特科技大学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动态系统控制博士



**Filippou Proedrou**  
能源安全专家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色雷斯民主大学能源学博士



**Jeffrey Reeves**  
文化安全专家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Syed Hussain Shaheed Soherwordi**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  
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爱丁堡大学博士



**Kate Tulenko**  
公共卫生安全专家  
Corvus 医学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Johannes Urpelainen**  
能源安全专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教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



**Vlado Vivoda**  
能源安全专家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产研究院研究员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余乃忠**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特约编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于铁军**  
国际安全理论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姚羽**  
网络安全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会评专家  
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会评专家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张金生**  
贸易安全专家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赵英**  
产业安全专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周树伟**  
社会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高端智库专家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



**朱新光**  
社会安全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 研究员团队



艾尚乐

金融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程永林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外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后



樊守政

恐怖主义问题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法学博士



侯颖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博士后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晋继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Ilan Kelman

风险与减灾研究员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研究所教授



李佳

文化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



陈永品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博士



陈玉梅

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  
电子高级工程师  
暨南大学政务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侯建雄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黄永弟

“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风险研究员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研  
究所所长



Irfan Ullah Khan

人口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



李方芳

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健康外交顾问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塞罗那国际健康研  
究所双博士



李乾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廖丹子**  
非传统安全理论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数字安防与非传统安全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刘凤元**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华东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刘金山**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天阳**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



**刘元玲**  
气候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卢矜灵**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越南语信息员



**麦方**  
财政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Bakirov Maksatbek**  
中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吉尔吉斯奥什国立大学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莫有恒**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候选人



**覃胜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山大学医学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Imran Ali Sandano**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Luis L. Schenoni**  
拉美安全研究特邀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  
圣母大学政治学博士



**汤取安**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中城卫保安集团原国际部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中国国家注册高级保卫师



**Diana Toimbek**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国际研究实验室高级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王彥兴

社会安全研究员  
广东省惠州市府办政策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王新和

北极问题高级研究员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王卓

社会安全高级研究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博士



谢法浩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谢贵平

边疆安全治理高级研究员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许涛

中亚地区安全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导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



张建华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章雅荻

移民治理方向研究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赵欣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法学律师研究会副会长



郑先武

区域合作安全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周龙

人口安全研究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副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周木亮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商务局国际招商处处长



钟晓君

经济安全研究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财经学院商务系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周燕萍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周章贵

资源安全高级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邹冠炀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英国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博士

# 1 前沿研究

## 国际安全研究中种族的平庸化：从赦免到废除

Nivi Manchanda

近年，国际安全研究非常公开地与种族主义作斗争。本文旨在反思为什么种族话语在国际安全研究中仍然如此普遍，反种族主义学科或哪些学科可以解决，并最终推翻安全研究核心的种族化逻辑。

本文首先肯定了在过去十年国际关系对种族血统斗争的进展，其为欧洲帝国和白人至上主义辩护至少是回避的。如果国际安全研究倾向于凝视问题，而不是对种族或种族主义的自我反省，那么可以将这个行为视为“安全”自我生成的性质。

一方面，种族被认为是“太平庸”，无法成为适当的理论化的事物；另一方面种族性在阐明政治的适当主体时，常常自动带入白人或欧洲人。“安全”的旗帜似乎赋予了国际安全研究的“伪人道主义”及其内在暴力的一种政治合法性，这对于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十分不利的。

本文认为反种族主义纪律是可能的。首先，国际安全研究需要转向正在塑造和挑战当代安全格局的运动、行为者和事件，这需要围绕暴力问题重新配置纪律；其次，国际安全研究学

术必须将自己置于赔偿运动的掌舵人手中，包括从大型军事和核项目撤资，并就奴隶制、殖民剥削这种种族不公正进行坚定对话；最后，国际安全研究要转向替代的认知模式，拒绝殖民和种族对“自由”和“安全”等概念的理解所固有的偏见。

本文认为，“安全”不仅是国际关系的种族化理论机构，也是政治理论的关键节点。虽然这种“安全漏洞的制定”会打破国际安全研究的种族关系，但“去殖民化”的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在反种族主义的道路上，承认和悔改是远远不够的。

来源：

*The banalization of rac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From absolution to abolit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52(S) 49–59*  
<https://doi.org/10.1177/09670106211033227>

编译：许汶



# 新冠疫情流行期间的粮食安全和全球粮食供应链断裂：对后疫情时代构建智能化粮食供应链的思考

Michael Omotayo Alabi and Ojelanki Ngwenyama

新冠疫情大流行揭示了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极大影响了食品从农场通过生产商最终到消费者手中的基本流动。事实上，新冠疫情的爆发为全球粮食公司敲响警钟，对制定后疫情时代战略提供参考。文章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研究新冠疫情对粮食安全和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并为建立更加智能和富有韧性的粮食供应链提供适当战略框架。

首先，文章对粮食安全文献综述进行详细梳理。第一，粮食供应、粮食可获得性、粮食利用和粮食稳定是粮食安全研究的四大支柱。第二，新冠疫情提高北美粮食供应链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风险。第三，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使大量民众失业、收入减少，财务状况恶化等经济原因侧面加剧了粮食不安全。

其次，文章选举美国和加拿大作为案例研究的对象。由于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和进口国，美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和出口国，两国是研究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典范。文章选取加拿大和美国两国的统计局数据，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扰乱了美国和加拿大粮食供应链，加

剧了两国粮食不安全的状况，从而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供应链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地讲，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不景气、农场工人短缺、粮食可获得性降低、农场商品运输受限和延误、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食品工厂关闭、食品质量不稳定、粮食贸易政策滞后等因素均对粮食供应链稳定造成冲击。

最后，文章认为建构数字化的供应链风险管理系统是建设后疫情时代更具韧性粮食供应链的理想选择。数字化的粮食供应链将提高全球粮食流通的准确性、速度和灵活性，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大数据和智能化赋能，建立粮食数据共享系统，数字化粮食供应链可以加强预测粮食风险的能力，并控制因粮食商品日益复杂产生的相关问题。此外，在数字化粮食供应链基础上，打造智能商业平台、点对点供应链、应用云计算技术和权力下放系统是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新手段，更是建立更智能粮食供应链的有效手段。

来源：

*Food security and disruptions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s during COVID-19: building smarter food supply chains for post COVID-19 era*  
*British Food Journal, 15 March 2023*

编译：尹金灿

## Tobías Belgrano: 阿根廷与丝绸之路协议

到目前为止，阿根廷是第一个加入丝绸之路协议的拉丁美洲中等收入经济体。考虑到墨西哥和巴西经济体的规模，阿根廷的加入绝非地缘政治中的小事。因此，SPCIS 采访了 Tobías，询问他对阿根廷加入丝绸之路协定以及中阿关系和西方对协议达成的看法。

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总统即将卸任。他将作为签署将阿根廷纳入世界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来最大区域贸易协定之一的丝绸之路的总统被人们铭记。丝绸之路协议，也称为“一带一路”倡议（BRI），是中国政府于 2013 年提出的一项庞大发展战略。该倡议的目标是建设基础设施，加强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该协议旨在创建一个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连接起来的现代丝绸之路，促进该地区商品、服务和

思想的流动。丝绸之路协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渴望扩大经济影响力并为其商品和服务创造新市场的愿望。中国政府认识到该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该倡议旨在为中国企业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和市场。

中国是阿根廷仅次于巴西的最大商业伙伴。2022 年 1 月至 7 月，出口额达到了 52151 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比 2011 年 1 月至 7 月的上一个最高值高出近 550 亿美元。中国是该国主要商品大豆的主要目的地。南美洲国家是向中国供应大豆的第三大供应国，每年平均出口 600 万吨。

此外，阿根廷加入丝绸之路协定揭示了中国意图在该区建立强大存在的意图。考虑到墨西哥和巴西经济体的规模，阿根廷的加入绝非地缘政治中的小事，揭示了北京意图在该地区建立强大存在的意图。在这种背景下，总统阿尔贝托·费

尔南德斯及其政府正遭受经济危机。加入协议的主要目的是获得 23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涉及能源部门、水和污水网络、交通和住房建设。此前，我们已经看到亚洲巨人在 2021 年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的扩张意愿，这表明，在阿根廷加入丝绸之路之后，我们发

## 特邀学者



Tobías Belgrano 是阿根廷天主教大学的助理教授，拥有阿根廷教廷大学政治科学学士学位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政府事务硕士学位。他主要研究拉丁美洲的民主和该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的成因，并进一步专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区的贫民窟社会整合，曾在非政府组织和公共部门工作。

现自己身处一个在商业层面上存在争端的地区。

此外，阿根廷还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费尔南德斯总统在多次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表示过。金砖国家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新兴经济体集团，南美洲领导人在 2021 年初访问莫斯科期间也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讨论了这个问题。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拉丁美洲机构教授 Evan Ellis 表示，“阿根廷的战略是深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更加接近中国的红色经济，以及阿根廷与‘一带一路’（或新丝绸之路）的情况，这在 2021 年峰会上成为官方立场。

在华盛顿，这并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佛罗里达州代表美国国会的马特·盖茨（Matt Gaetz）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他表示担忧，称阿根廷是“美洲关键的国家 and 经济体”，并补充说：“这个国家刚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签署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倡议。相比之下，中国的成本为 237 亿

美元，与美国在中东建立杀与血的民主耗费的数万亿美元相差甚远。”

阿根廷参与协议在国内也引发了担忧。其中一个担忧是，一带一路可能会增加阿根廷对中国的依赖，而中国已经是阿根廷重要的贸易伙伴。批评人士认为，这可能会限制阿根廷实施独立经济政策的能力，导致经济主权的丧失。此外，为一带一路项目所需的基础设施开发投资可能会导致阿根廷的债务不可持续。如果这些投资未能带来预期的回报，这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和财务不稳定。

然而，我们也可以说华盛顿在面对亚洲进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犹豫。我们需要回到 2006 年，看到美国上一次在与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尝试。自退出 TPP 以来，白宫没有提出任何能够吸引拉丁美洲国家并激励他们忽略来自中国的提议的严肃提案。唐纳德·特朗普退出 TPP 只是邀请成员国（智利和秘鲁）转向习近平的势力范围。



同样，南美共同市场与欧洲联盟之间的协议也并非吉兆。尽管有重大的公告，但由于法国的抵制（官方原因是亚马逊的森林砍伐，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其农业部门），进展被阻碍。

西方大国的不作为使得南美国家逐渐在贸易协议上转向中国。在轻微的情况下，如乌拉圭和智利，这些都是简单的贸易和技术转让协议。在更具体的情况下，如在委内瑞拉，中国是该石油生产国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国家是理性行为者，寻求最大化利益。在一个逐渐变得越来越双极化的世界背景下，签署这些协议在外交和商业方面有其成本和收益。丝绸之路协议批评者表示的最大“恐惧”之一是接近中国的国家民主受到威胁的风险，以香港和台湾为例。然而，在智利、意大利或乌拉圭等国家，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战态度，没有人能认真地断言这些国家的民主受到了亚洲巨人引起的威胁。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协

议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这对阿根廷来说是好消息，特别是考虑到近年来签署并实施的贸易协议寥寥无几。同样，两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可能意味着阿根廷在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前提是，当然，这些协议得到实施，我们的国家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溜走。

翻译：巢未



# James M. Dorsey: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的改善： 紧张局势的缓解还是根本性问题的解决？

Dr. James M. Dorsey 认为，尽管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交关系近期有所回温，但离真正的和解还相距甚远。他认为，任何试图从这一现象中看到和解的人都在误读形势。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得到解决。这次的核心是管理而不是解决冲突，确保冲突不会失控。部分协议内容包括交换或重新开放驻利雅得和德黑兰的大使馆。可能会暂停伊朗对胡塞武装的支持，但不一定是政治支持，这将使沙特从也门撤军，但这并不意味着也门战争结束。这只能意味着沙特的干预结束，而也门战争可能会以内战形式继续。当然，考虑到伊朗的经济形势，以及沙特目前正致力于经济多样化和主流化，显然这些冲突对他们并无益处。你真正看到的是过去两年中东地区的情况，即强调

经济关系，推迟解决争端和冲突。至于这种做法是否会奏效，时间会证明一切。

至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和解是否意味着中东未来安全格局的积极变化，Dr. James M. Dorsey 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尽管我们会看到一段时间的地区紧张局势有所降低，但所有问题仍悬而未决。伊朗与黎巴嫩和伊拉克的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海湾国家之间，特别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和叙利亚之间仍存在竞争与对抗。核问题也依然存在。有很多问题，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得到解决，或者没有一个在沙特和伊朗之间进行过详细讨论。Dr. James M. Dorsey 强调道，他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不能演变，而仅仅是基于目前的事实，现在还为时过早，后续走向仍然

Dr. James M. Dorsey 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兼职高级研究员，以及维尔茨堡大学球迷文化研究所的联合主任。他是《中东足球的动荡世界》博客的作者，同名书籍的作者，以及与 Dr. Teresita Cruz-Del Rosario 共同撰写的《东南亚与中东及北非之间的比较政治转型》、《变动的沙漠：中东和北非的体育与政治》，以及《中国与中东：冒险进入漩涡》。在中国的第三方调解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交关系近期取得显著突破。因此，SPCIS 采访了 Dorsey 博士，询问他对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关系的看法。

无法预测。

关于中国在促进中东紧张局势缓和方面的作用，Dr. James M. Dorsey 同样认为需要进一步观察。他希望读者牢记在此之前，在伊拉克人的主持下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在阿曼人的主持下进行了两年的谈判。在去年10月伊拉克政府换届之前，也就是伊朗和沙特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已经有关于伊朗外交官作为伊朗外交使团前往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一部分返回吉达的讨论。所以很多东西已经在筹划之中。所以真正的问题将是，中国是否仅仅是一个促进者，让一切顺其自然，或者它会努力推进这一进程并确保这一进程不会出轨。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关系中仍存在哪些安全问题的讨论，Dr. James M. Dorsey 指出一切都还存在，没有问题得到解决。沙特阿拉伯认为伊朗在各阿拉伯国家的代理人问题，无论这些是统一的团体还是代理人，都没有解决。像真主党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这样的

团体，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让沙特阿拉伯担忧的伊朗弹道导弹计划问题也没有解决。核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伊朗认为自己被美国的伙伴包围，并受到制裁。因此，所有这些问题，如弹道导弹、代理人等，都是他们的防御策略，他们在这方面不会让步。换句话说，原则上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也门问题。Dr. James M. Dorsey 希望读者意识到，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爆发时，双方存在外交关系。外交关系只是提供一个交流的渠道，并非灵丹妙药。换句话说，他们拥有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离解决这些问题更近了。Dr. James M. Dorsey 认为，只要地区内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不会有解决方案。他认为目前的情况只是降低了紧张局势，但并未改变根本的安全状况或问题。

翻译：刘泽凡



## 章雅狄 余潇枫： 和合治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建构

### 一、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加速了国际局势分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一方面，逆全球化回潮与全球化浪潮相互冲撞、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盛行，冷战思维大行其道，许多国家重新回到国家中心主义的立场，大国之间难以超越的意识形态壁垒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安全困境”的悲剧再次重演；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凸显人类脆弱性的同时，也凸显了全球“因病相连”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创

新全球治理模式的必要性。

全球治理是一个世纪性命题，也是一个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性考题。“西方中心论”思维下的霸权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也难以适应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当前的全球治理失灵本质上源于治理体系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模式。为此，本文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在对全球治理进行全方位反思的基础上提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和合治理”，并通过与其他全球治理理论比较，阐明了和合治理的原则以及不同实践类型（和合体、聚合体、竞合体）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不同程度超越，进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当前，俄乌冲突更加凸显通过和平谈判、协商对话解决纷争的可贵，也只有在“去冷战思维”“去战争方式”的和平环境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和

合”思维的优势。对“和合治理”的探究，其实质上是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局限性的一种反思与超越，也是通过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的再建构而作出的对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的理论回应。

### 二、全球治理的困境

全球化是工业化的必然延伸，全球治理是全球化的题中之义。狭义上讲，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始于半个世纪前。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全球治理的

## 研究员介绍



章雅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本文在探究当前全球治理困境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提出了超越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和合治理”理论。“和合治理”以“和合”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和合主义”价值范式为理论内核，以“类群—和合”与“宇宙—和合”为两大基本假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重要原则。和合治理在与全球不同治理理论比较中凸显其体现中国智慧的治理行为体的包容性、治理结构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开放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公正性，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和合体”“聚合体”以及“竞合体”的治理类型，体现出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现实可能，为“和合治理”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路径。

实践过程仍然艰难、成效有限，围绕重大议题的国际合作往往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究其原因，全球治理主要面临着五大困境。

### （一）绝对主权与相对主权的冲突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跨越边境、难以明确划分归属或责任边界，凭借单个国家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不断显现不仅使国家绝对主权理论受到质疑，而且对当前以国家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来自两个层面：

一方面，全球治理要求主权国家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与挑战切实地负起独自的责任，承担国家在独享主权方面应尽的义务。例如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以下简称 WTO) 规则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制定与 WTO 相衔接的经济运行规则，当成员国国内的经济规则与国际市场的统一运行规则发生冲突时，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规则必须作出相应的修改。又如，1951

年《难民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规定了“不推回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即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至其原籍国，但决定谁是否能够入境是一国主权的体现。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要求国家治理在主权方面有所让渡，并且国家主权随着国际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有所弱化：或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国家不得不让渡部分主权；或随着国际组织在解决跨国性全球问题的作用日益增强，从而要求实现国家主权的部分共享。与现实的质疑与挑战相应，在法理上“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多元论”等学说纷纷兴起。更有学者断言，基于将国家作为重要分析单位的西方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合时宜。

### （二）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主

要手段，其作用在于通过构建国际规则、推动国际体系成员行动规范化，促进全球治理走向法治化。全球治理的扩展也推动了国际法治的深度和广度。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上，学术界有二元论与一元论之分。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彼此不相隶属。一元论则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组成一个普遍的法律秩序。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本质是，国家在国家治理中如何执行国际法，即如何履行国际法义务的问题。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全球治理并不是超国家的法治，关于全球治理的任何一条国际公约和跨国协议都必须得到主权国家的首肯和签字才能正式生效，因此，全球治理的任何一项措施，只有通过主权国家政府才能得以实施。这势必会带来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一旦离开主权国家，全球治理就是一句空话。

许多国际公约签署情况不理想的或无法执行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相互冲突，民族国家仍以国内法优

先，拒绝签署该国际公约。在移民领域，这种冲突显得尤为明显。以全球移民治理为例，关于移民的国际公约旨在保护移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国内法则往往出于安全考虑限制移民大规模进入。如2021年11月，波兰通过了一项紧急法，暂停《欧洲人权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的相关难民待遇条款。

### （三）全球集体行动难题

主权冲突与法律冲突的语境必然带来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难题，具体表现为驱动力来源与利益选取困境。当前各国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正在被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国内的政治极化而削弱，各国无法达成普遍共识，个别大国甚至选择退出多边机制，全球治理的效能进一步降低。现实主义认为集体行动的驱动力来自于权力与权威，如果在治理过程中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国家之间的合作很难实现，因此霸权是实现和维持合作的唯一有效方法。自由制度主义认为集体行动的

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国家利益的实现，集体行动是基于主体之间共同利益与各自的成本计算。而建构主义则认为集体行动基于主体之间不断互动而建立起来的认同与信任。

处于全球治理时代的民族国家常常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面前陷入两难选择。民族国家的主权至上原则使得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各国自身的利益往往并不等同于全球利益，这就使得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矛盾。因此，处于全球治理时代的民族国家常常在维护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面前陷入两难选择。当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行动很难开展，进而阻碍全球治理的推进，导致全球治理无法有效应对新危机与新挑战。

### （四）文明间的异质性对冲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复合体，存在不同的文明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思想理念。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



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文化冲突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全球社会的动荡。如何超越、化解文明、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异质性冲突，塑造集体认同感是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又一挑战。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构建了西方文明同挑战者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范式，并认为文明的冲突逐渐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他认为在全球治理中文明冲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不同族群文化之间碰撞、摩擦；二是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误解与不信任；三是在文明对话，制

度相交的时候，无视非西方的元素，或者强制性要求非西方元素融入所谓的主流文化与制度等。

但“文明冲突”理论片面地捕捉到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一面，忽视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同文化、民族、文明与制度之间仍然在不断地互动与交融。“文明冲突论”的本质是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范式与“非友即敌”“零和博弈”的冷战

思维。不同文明、思想之间的交流成本日益增高，使得全球化进程在世界各地遭遇不同程度的矛盾阻力，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信任鸿沟。俄乌冲突正是西方世界深陷冷战思维窠臼、固执于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具体表现。

### （五）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价值与规则霸权

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共识是全球治理拥有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治理能够得到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全球治理中最突出的意识形态问题源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当前国际社会仍充斥着西方统治世界的帝国时代遗留的霸权与地位不平等现象，具体体现在：全球治理在理论上主要源于西方理论，在治理理念上很大程度上联结了西方价值（自由、民主、分权）；在治理规则上绝大部分仍由西方国家制定。这种单向的一元价值取向取代了全球治理的多元价值需求与选择。如对于非霸权国主导的治理实践和治理进程很难得到霸权国的支持，甚至

受到排挤和打压。其他所谓的小多边形式或双边协调治理模式，霸权国一般也不会鼓励。西方和非西方实力的变化凸显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中权力和实力不相匹配的问题。这在根本上反映出西方霸权秩序中的权力观念与排他意识。

国际秩序正迅速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秩序转向后西方的“深度多元”秩序，即财富、权力、政治和文化权威都更为广泛的分散，从而形成“去中心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 Globalism），并进一步趋向“命运与共的全球主义”。随着霸权的衰退，多元世界逐渐显现，全球治理开始趋向扁平，后霸权世界会出现一个以多层面、多领域和多主体为特征的多元的复合治理网络，全球治理由此释放更大的活力与灵活性。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特色”“中国视角”“中国智慧”“中国路径”“中国学派”的“中国范式”讨论，西方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长期以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以西方为重心，西方的视角不能代表全部。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中国有

不同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传统吗？有哪些方面与众不同？如何解释这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

### 三、和合治理的理论建构

中国哲学有着丰厚的治理思想土壤。《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百家都是“务为治者”，由此形成了中国源远流长的“治道”传统。儒家的“以礼治国”、礼制与德治相配、角色和责任的统一；道家的顺应民意、遵循自然本性；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都对“治理”有独特的解读。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不仅需要透析全球治理的新变化与新趋势，更需要通过理念的创新及理论的提升不断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好的目标迈进。笔者从理论假定、核心范式、治理类型、治理原则等四个方面来构建“和合治理”理论。

#### （一）和合治理的理论假定

和合治理的理论假定是关于人类历史与宇宙演化的规律

性、因果性的一种假定性解释，其依据是以往的人类历史和科学原理。

#### 1.“类群—和合”假定

和合治理的第一个假定是基于人类历史走向的“类群—和合”假定：人类总体上往和合的方向发展，历史的未来趋向具有和合性。从共时态来看，人类作为具有“类群”规定性的类存在物，是“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频发，人类遭遇“普遍性威胁”与“生存性焦虑”，这种不安全感可以催生一种“类价值”，如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四大自由”，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所体现的发展价值等。形成全球价值共识能帮助人们最大可能的消解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防止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知误解与战略误判，进而最大可能促进本体安全的获得。从历时态来看，人类社会沿着一条“冲突与合作”的回落与上升的不断趋向和合的“演进曲线”：“战争—竞争—竞合—和合”。人类历史不断地摆脱战争的噩梦，抛弃竞争的恶念，通过良性的竞合，不断从野蛮走向文

明继而朝向命运共同的和合方向发展，表明了“类群—和合”是人类必然的历史走向，也是人类固有本质的价值呈现。

#### 2.“宇宙—和合”假定

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去应对。量子理论中的“互补原理”“测不准定律”“整体不可分割定律”“不相容原理”不仅用物理性包摄了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建构起了全新的“量子论”视域，而且颠覆了以往的如物质论、原子论、决定论、机械论等经典的“原子论”世界观。根据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我们应将超越微观和宏观的简单分界、超越主观和客观的机械分裂，将叠加、纠缠、不确定、非定域性、非分离的整体性等量子思维、量子逻辑、量子概率引进一直受制于牛顿经典思维、传统形式逻辑的社会学科中。量子世界里，每个粒子具有无数条路径穿越“设定”的测试通道实现“求和”式的“聚合”，根据量子的这一“和合”特性，物理学家费曼创立了以“量子求和”（或称历史求和）为标志的量子电动力学。万物的本

质像一组变换不定的“能量之舞”，但最终却是“求和”的，“能量之舞”的量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始终“合拍”。“量子之舞”就是“宇宙之舞”，是“求和”与“合拍”的叠加——“和合”。可见，量子理论是较原子理论更高级别的知识框架，“量子论”是较原子论更具现代科学基础的宇宙观。量子理论对宇宙图景的解说是对国际关系经典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根本性超越，未来的“量子国际关系”研究也会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资源。

由此我们可以引出和合治理的第二个假定——基于量子求和的“宇宙—和合”假定：和合是宇宙演化的本质，也是万物总体有序的根本。一方面，在宇宙生命体的演化中，“和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物质、能量、信息三者是宇宙万物的基质，也是生命体的基质，但生命体较之于无机物质更具有其和合性。现代物理学证明，量子是万象宇宙的最小“构件”，所有的物质与生命都是量子的聚合体，而生物体或组成人的细胞却像一台量子计算机，永

不停息地在进行着复杂计算以“求和”与“聚合”形成“和合”状态。例如，“对激光或从底部加热的液体切断其能量供应，那么已形成的结构将很快毁坏。然而生物却能设法构筑牢固的结构，这一点无论对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的生物分子如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 还是对骨骼和整个身体，都是成立的。”可见大自然已能够通过发挥“和合”功能，让生物或生物体能形成结构、关联结构、升级结构，进而使其生成更具可靠性的进化能力。另一方面，和合共生作为宇宙之道，在混沌中造就了无数种类的有序结构，无论是动物界还是植物界，其精妙无比的结构与和谐协调的形态，无不让我们惊叹，“甚至在无生命物质中，新的、井然有序的结构也会从混沌中产生出来，并随着恒定的能量供应而得以维持。”因为无论是宇宙中的秩序，还是生命体的自组织功能，都离不开“要素”间的“关联”“纠缠”与“和合”。

量子理论为“宇宙—和合”假说提供了充分佐证。如果说

传统经典本体论从人的可分离的个体性来证得人的“社会性”而导出“自然状态”等规范理论的话，那么量子本体论则推翻了这种“原子论”与“竞争性”观点，而是从人的不可分离的整体性来证得人的“合作性”与“社群性”，进而导出新的观点：“社会性与其说是奋斗的成就，不如说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与准则”。量子理论特别指出，“竞争和冲突是人类的默认状态”的假设是经典世界观所为，而事实上，“量子过程的‘合作’本质是由于纠缠”，人只是行走的波函数，因而量子世界观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人类看作因果性地相互作用的独立因素，而应该同样将他们看作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关联投射”，因此“人类合作的倾向并不是非理性的错误反常，而恰恰是我们应该预料到的。”

总之，“类群—和合与宇宙—和合”假定的合理论证为和合治理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凸显了和合治理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前提，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元理论范式与全新的基底价值坐标。



## （二）和合治理的核心范式

和合治理的核心范式是“和合主义”。和合主义的精神内核与思想起源是“和合”。“宇宙和合”与“类群和合”的演进规律不断生成人类的和合文化与社会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人类的“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既有源自于希腊城邦伦理与“世界公民”观的世界主义，又有源自印度神灵伦理与“戒杀至善”观的非暴力主义，更有源自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历史。

在中国，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过“和”“合”二字。“和”指演奏吹打类乐器，引申为声音的和谐，后被广泛运用到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如和谐、和平、和善等。“合”指器物相扣合之意，引申为多样事物相配合、融合。“和合”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郑语》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其意为将“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加以和合。《中庸·礼记》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和”是天下人们共性的普遍规则。“和合”不仅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

的包容性与宽容性，如求同存异、多元和合、互济双赢，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生俱来的协作性与平衡性，如协同合作、以和谋利、相异相补、协调统一等。“和合”是达成“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境界的关键路径。”“和合”强调不同事物的内在统一，吸取各事物的长处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从而发展演变产生出新的事物。“和合”是在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存在的前提下，通过“合”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化解各类矛盾不同的事物，让各个主体、元素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保持平衡。

“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源于“关系”，无论是“类群—和合”还是“宇宙—和合”，本质上都是关系的和合。关系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实体只是关系的一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先有关系，再有实体，整个世界是由不同的关系组成的，“关系性实在”即世界的本体。中国人的关系思维在《周易》中有系统的表达，64“卦”即64种关系，“一阴一阳为之道”意思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阴阳互补，没有严格界限，这种思维就是一种相互依赖、依存的关系模式。阴阳就是一种元关系，两者相生相克，形成了永恒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物，这就是关系主义的本质和由来。西方学术界对于“关系”的阐述并不少见，但西方的研究大多把关系视为一种客观性的根本事实或是一种“友好的联系”，而未能使西方治理理论真正开启本体论的关系主义转向。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西方世界所不具备关系本体论的丰厚土壤，因而中国人理解的关系是放置于更大的社会脉络中的。与西方文化孕育出来的寻找世界“本源”为目的的线性思维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关系本体论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治理是各个主体在复杂关系情境中，面对变化着的治理对象，不断使其自身镶嵌其中以不断促成和合共生的实践活动。

和合主义的存在论视界是“天下观”。中国人用“天下观”来观照人类社会，强调“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天下观。“天下”是中国对世界秩序模式作整体

化与和合性的思考与解读的总体对象，“天下观”是一种全球观照的视界，将世界内部化，摒弃传统国际政治内外划界、其他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对于国际社会与世界秩序的解读总是停留“基于识别敌友并且活在永远斗争中的政治概念”。西方现代政治框架是由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而定义的，国家作为最大的主权单位。而“天下观”强调共在存在论，凸显去中心、去等级化取向。在“天下无外”的原则下，相互利益最大化比起自身利益最大化更能够在实际效果上保证每个人或每个国家的利益。

在传承中国传统理念与治理思想的基础上，“和合主义”既是和合治理的核心范式，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范式。与西方本体论传统中的“理性”，认识论传统中的“原子实体主义”以及方法论的“二元对立”、意义论的“唯我”有着根本的不同，和合主义的本体论前提是“关系（性）”，认识论框架是“整体关系主义”，方法论特征是“中庸”，意义论指向是“共享”。和合主义通过“优

态共存”前提下的“和合共建”达到“社会共有、权利共享、和平共处、价值共创的理想状态。共生原则、共建规范、共创关系与共享未来

是和合主义的主体内容。和合主义的价值范式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本质特征，超越了历史主义与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的二元对立。因此，在跨国家、区域、双边、多边的复合性的治理环境中，以“和合主义”为价值范式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的深入研究。和合主义是关于“天下关系和合”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中国“整体论”“共存论”的重要思想，吸纳了现代“系统论”“相互依存论”的知识图谱，为和合治理的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核心范式。

### （三）和合治理类型

和合治理以“和合”为宗旨，以“关系”为本体，以“天下”为整体，认为全球治理的实质并非权力、利益与资源的争夺而是关系的建构与和合共生的达成，治理的本质就是探讨多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模式。关系本体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景观：世界是由“流动的关系”（Moving Relations）而不是一系列的“事件”组成的。在关系中，过程与行为体相辅相成，共生共存，过程先于行为体，过程建构行为体。基于此，我们根据互动频率、互惠类型、发展认同等三个核心因素将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关系进行强弱程度的区分。

就互动频率来说，互动越频繁关系越紧密。“互动”一词常出现在心理学、社会学与国际关系学中。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将“互动”理解为关系，认为单元的相互关系就是互动。互动不仅是一种关系，更是一个过程。主权国家的互动包括就治国理政、经济发展、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交流、协商、研讨等，以及双方高层的交往、互访等。

就互惠类型来说，它呈现关系的信任性与亲密性程度。互惠这一概念由社会学家贝克尔（Howard Becker）提出。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互惠模式，即亲缘互惠、弱互惠和强互惠，

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有认同性互惠、协同性互惠和契约性互惠。认同性互惠多存在于认同性较高、同质性较强的国家之间；认同性互惠并不基于“未来回报”，而是基于善良、关系理性与纯粹利他。协同性互惠常出现在同质性较弱但局部认同性较高的国家之间。尽管这些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历史等方面并未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某一领域的相互认同较高，因此彼此的互惠意愿逐渐增强。契约性互惠建立在获取更大的利益或减少损失的基础

同，国际认同指各方都坚决支持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政治认同指各方都尊重并支持对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文化认同指各方都有意愿扩展文化交往，加强相互之间的文明互鉴互融。而发展认同则是国际认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统合，是国家间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总体上的相互认可与协同以及经济上的相互帮助与促进。根据上述三个建构行为体关系的核心因素，和合治理的实践类型具体可分为“和合体”“聚合体”“竞合体”（如表1）。

价值追求，将整个世界视为休戚相关、和合共生的共同体，彼此独立但又相互影响，彼此互通但又多元共存，以超越狭隘的国家本位主义，彰显人类情怀。“和合体”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替代词，既是一个利益与智识的普遍共享体系，又是一种“无外”的共在秩序。

和合体治理在实践中主要分为倡导型与实体型。倡导型和合体治理指针对特定问题、在一定的领域内进行政策倡议或达成共识，但尚未付诸于行动的命运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主要涉及的是一种全球范围的人类共同福祉和关怀，要求所有成员超越自身本位，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理念。实体型和合体治理指已经得到各国认可，从国际倡议进入建设日程的命运共同体，可划分为双边命运共同体和多边命运共同体两类。实体型和合体治理类型强调在双边/多边互动的过程中深化“命运与共，和衷共济”的理念，促进共同行动，实现共同发展。

表1 和合治理类型

和合治理类型	和合体	聚合体	竞合体
互动频率	高	较高	较高
互惠类型	认同性互惠	协同性互惠	契约性互惠
发展认同	强	较强	较弱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上，依据合同安排、双边/多边协议达成互惠。这种类型的互惠广泛存在于异质性冲突较强、认同性较弱的国家之间。

再就发展认同来说，它呈现关系的非对抗性与某种程度的协同性。发展认同主要包括国际认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

### 1. 和合体治理类型

该类型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以关系理性为基本原则，以“天下”“类群”为价值坐标，旨在创造互助环境、培育互信精神以应对共同挑战，推进普遍价值取向的形成。这是一种“和衷共济”式的全球治理形式，即以“天下无外”“人类一家”为



## 2. 聚合体治理类型

聚合是指把分散的行为体聚集到一起的过程，是一种富有弹性且具有“化学效应”的关联形式。这种关联是开放的，旨在创造一种开放包容的环境聚集多个主体，通过一系列的沟通、对话、协商等非冲突方式，搁置冲突争议、促成统一行动。聚合体是与“结伴而不结盟”相匹配而特有的治理方式，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中的各类“非对称关系”与“多节性结构”，注重交互过程中的“和合性”“求同存异性”“可再生性”。与和合体不同，聚合体治理模式并不要求国家间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的同质性。在聚合体中，尽管各主体尚没有建立起共同价值观或达成认同，甚至依旧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冲突，但却仍然能在特定时段或一定范围内通过聚合而共同行动。虽然聚合体的同质性弱，但局部问题上认同性较高。聚合体治理类型遵循互助逻辑，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聚合式协同与互助反映的是一种动态整体性观念，这与西方个体性观念有着明显的

区别。在应用伦理上碰到两难情形时，聚合体治理在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所表现出的“灵活性”“模棱两可”“暧昧”的特点往往有利于困境的突破与解决。

## 3. 竞合体治理类型

“竞合”指的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合作与竞争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如同阴阳两极，是一对矛盾却又相互依赖的力量。中国的阴阳关系就是典型的非二元对立关系，因为阴阳互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补。竞合既不侧重于竞争，也不侧重于合作，而是包容了竞争与合作，通过竞合的“良性化”去消解潜在的异质性冲突。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与文化，这为国家之间的交往开辟了新路径。当面临冲突或竞争时，中国的做法是“求同存异”，积极寻找根本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竞合体治理类型致力于在竞争与合作之间构建一条具有超越性的中间道路，

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新关系。

竞合体治理、聚合体治理与和合体治理是三种价值排序呈现递进关系的治理类型。竞合体治理之下成员流动性较强，发展认同较弱，也是最初级的以契约性互惠为特征的全球治理共同体。虽然成员也具有较为频繁的互动，且成员之间互动影响也较深，但成员之间还不一定有明确的共同体意识，竞争、冲突时有发生。而聚合体则处于竞合体与和合体之间，其成员具有一定群体意识与归属感和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发展认同较强但是成员仍带有比较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可能因为面对共同的威胁或具有共同的困难而人为组织起来的，具有一定的利益导向，是以协同性互惠为特征的全球治理共同体。而和合体则是最高级的以认同性互惠为特征的全球治理共同体，成员具有共同的心理、文化属性、行为特征，发展认同强，关系结构最为紧密。当然，在实践中，三种形态的全球治理共同体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清晰，有时也

会有交叉并在一定程度下可以相互转化，但在总体上它们超越了灾难性的“战争”、对抗性或恶性的“竞争”。

#### （四）和合治理原则

基于以上的理论阐述，本文进一步建构和合治理原则以促成和合治理目标的实现，如果说和平、和解、和好、和合是和合治理不断递进上升的价值序列，那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实现这一价值序列递进的基本原则。

##### 1. 共商原则

共商是共建共享的前提，也是国际合作原则的具体化。在国际关系中，共商指遵循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能通过共同协商的方法平等参与、制定国际合作的内容、形式及目标，不仅包括政府之间的协商，也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公民之间等的协商。在此过程中，各主体通过互动、交流，利用一系列的理念、规则和资源以促成并达到共同的目标。共商是集思广益，坚固各

方利益，体现集体智慧与创意。共商主要采用对话、协商的方式，并以非传统权威的制度性安排为基础。共商原则促进各国在国际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尊重各主体的参与意愿，通过共同协商达成政治共识、寻求共同利益，有利于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共商的过程超越单纯的追求效率，更加注重的是信任的培养，各方利益的关切，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场域。这样就超越了国家主权的原有限制，消解了绝对主权与相对主权冲突而导致的紧张与冲突，如东盟（10+3）在解决关涉主权敏感性问题上的共商与协同就是很好的范例，再如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也同样采用共商原则，把因主权关系极度紧张的“冲突之海”努力转化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 2. 共建原则

共建是在共商基础上达成共识后的实施路径。共建即共同参与、治理、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体现的是共同参与，发挥自身优势和潜能。在面对

困境与挑战时，各治理主体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共同面对，共同治理才能够实现各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追求互利共赢的合作共建。在尊重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前提下，化解各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发不同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明确各主体的权利与责任，推动相互融合、协调，形成合力，最终促成有效、良好的治理实践。各主体各尽其力、各尽所职、各施所能、各得其所，共享资源和权利，共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共塑造和合文化与认同，最终形成一个兼容并包的治理环境。在共建的过程中形成议题联盟、联合战线、政策网络、公私伙伴关系因其具有灵活性和软约束性的特征，在实践中易于推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升全球治理的效率。如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集体行动难题”十分突出，但中国在倡导共建原则的同时彰显自己负责的大国担当，使得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治理进程得以加快，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好评。

##### 3. 共享原则

共享是共商共建的宗旨和目标，是对共建成果与美好未来的共同享有。有关共享精神，先贤典籍早有讨论。《周易》同人卦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其核心理念是人与人之间要团结互助、合作、共享，以共享的精神才能达到共赢。在同人卦之后是大有卦，这种编排次序有意告诉人们，只要真心合作、共享，就能带来物质上的丰收。共享即各主体平等发展、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在合作、共治中寻找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坚持公平合理的分配原则，实现多赢共赢，互惠互利，让共同创造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主体。随着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共生不断深化，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强调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享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共享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在经济上，世界各国积极寻求新的合作点，实现经济共同发展；在文化上，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实现文明和谐包容；在安全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类群”意识，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最终各国都能够

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较大的国情区别与文明差异，但共享原则的采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明间存在的异质性对冲，使得“一带一路”倡议能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健康推进。

共商、共建与共享原则，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共商是基础和前提，共建是核心和路径，共享是目标和动力。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仅体现出超越原子式个体的“类群—和合”价值，标志着摆脱原子式思维的困境，从个体走向完整的人，也体现出了“宇宙—求和”的量子世界观。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和合治理基本理念的完好表述，也是全球和合治理观的精准表达。

## 四、和合治理与其他全球治理理论的比较

自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首次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以来，不同领域学者为全球治理理论做出不同的贡献。随着国际关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

基于各自的方法论把全球治理纳入为自身学科的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倍受重视。任何一种全球治理理论都是基于特定的本体论之上。对世界本体有何种认知，对这种认知有何种理性根据，以及如何按照这样的本体认知去拓展治理方法、路径是治理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所在。

在梳理不同全球治理观对全球治理概念所作的阐述和解读的基础上，将和合治理与主流的全球治理理论进行横向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度剖析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也有助于我们探寻和合治理概念在全球治理理论的坐标体系中的位置。作者注意到这么一种观点，全球治理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国际关系理论和治理理论。

### （一）以国际关系理论为源头的全球治理理论

国际关系基于自身的方法论把全球治理纳入自身学科的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其主要理论流派为全球治理理论不断贡献真知灼见。

#### 1. 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理



## 论

现实主义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范式，该理论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以自助为基础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从根本上讲，现实主义是不赞成全球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的，但这不妨碍两者之间形成一定的交叉。以新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理论相信物质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将“权力视为社会科学最根本的概念”。“霸权稳定论”正是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认为某一个霸权国或领导者的权威引领作用起着“全球支配作用”。在实践中，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模式的弊端已经显露：美国退出多个条约和组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加强气候治理框架努力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霸权国随意违背现有的国际准则与契约精神，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以自我为中心，不与他国家商量，带头退出或挑战现行的国际规则，坚持“本国优先”，甚至以“战争方式”或“挑起战争方式”解决国家间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国际机构在推动全球抗疫合作中的权威地位与作用，助长各自为政的单边行为，消解全球合作的动力。显然，坚持过分注重物质利益，坚持以本国利益出发，以国家为单位思考、治理全球性问题缺少全球关照，已经无法适应互通、流动的世界，也难以脱离不同主体之间的现实纷争与矛盾。

## 2. 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治理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国家不再是治理的唯一中心或主体，而应转而关注国家之外其他主体的作用，如跨国专家网络、知识精英、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并强调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将制度视为推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施动者，认为国际体系存在着能够影响国家行为的机制结构，强调全球相互依赖、多边合作。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治理理论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现实主义范式，为全球治理理论提供了更加复杂和多元的新视角。

然而当前我们看到的全球治理中制度与规则正在逐渐被“弱化”，多边机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全球治理的进程严重受阻。代之而起的是“伪多边主义”（小圈子多边主义、本国优先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的兴起，即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划线，强行对全球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区分，原来多元一体化的治理规则制度式微。如一些大国以意识形态划线利用国际组织（七国集团、五眼联盟、北约、四国集团等）排挤他国，搞对立对抗，打造闭合排他性的全球治理领域的联盟，陷入俱乐部制度主义的困境。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治理模式“弱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国际组织的功能失调导致全球治理陷入低效。西方国家眼中，国际规则就是普世价值，国际组织成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工具，国际社会成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封闭的、单一的联盟对峙。

## 3. 建构主义全球治理理论

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对国家身份、认同对利益塑造、建构的作用，凸显国际规范在形

式与内容上的复杂性与动态多样性。建构主义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全球治理中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以及全球治理概念都是建构的、国际互动的产物，全球治理的结构、国际规则与制度都是国家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果，并且全球治理是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不断协调、互构的过程。但是，建构主义在注重社会规范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的同时，容易忽略物质力量对观念变化的影响，容易导向精英主义偏向，即整个治理体系的构建大部分由政治精英们来完成，使在国际社会中仍充斥着西方统治世界的帝国时代遗留的霸权与地位不平等现象。如全球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 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国际货币金融机构采用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投票权制度。这直接导致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得不到充分体现。

## （二）以治理理论为源头

### 的全球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则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展开，以变化的现实世界为基础，从治理问题、主体、机制等要素着眼提炼全球治理理论。

#### 1. 元治理理论

该理论假设政府通过扩大参与的方法，让政府之外的各级组织尤其是私营部门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过程，使其决策过程更具包容性。政府依靠等级治理，私营部门依靠市场治理，公民依靠关系网治理。元治理旨在“协调三种不同治理模式以确保他们中的最小限度的结合以达到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决策结果的合理化”。元治理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力求从源头思考治理方式，强调如何进行治理结构的安排，以协调不同治理形式之间的关系以消除三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促进其融合。但元治理认为政府既要与其他治理主体平等，又要在治理失效时扮演引领、仲裁的角色，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同时，元治理也低估了三种模式之间的差

异，在一些复杂情境下，差异有时候大于相容。

#### 2.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有可能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获得共同利益”。未来的全球治理在性质上必然是多中心的，“在全球一级谈判中达成的解决办法，如果没有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各种努力的支持，就不能保证有效地发挥作用”。相比传统的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有选择多元、搭便车减少以及决策合理三个优点，但也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在全球治理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也并不稳定，有些是相互合作、互利共赢的；有些是相互竞合或局部对冲的；而有些则是相互制约，甚至对抗的。在治理过程中，难以避免各主体之间的现实纷争与冲突，甚至会陷入针锋相对的困境之中。其次，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是通过多个主体之间的竞争、协作实现公共

利益。这容易导致无规则的不良竞争出现,使得治理分散化,反而降低效率。更重要的问题是种族偏见、文化差异以及利益驱动向来都是全球合作的障碍所在。此外,在一些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合理划分不同决策中心的权利和责任,是否存在一个凌驾于不同决策中心之上的公共机构及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权威来平衡各方的利益,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法规是否能及时跟进等都是多中心治理理论需要解决的难题。

### 3. 网络治理理论

该理论认为网络结构相对稳定,网络中的参与者相互依存但又独立自主,参与者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能够灵活和创造性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等。因此,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网络治理可以最大程度地简化治理的形式和减少治理的层级,使治理简单化。网络治理特别重视参与者间的互动,因为个体对决策整体的认知和影响决策结果的能力都非常有限,而他们在网络中互动学习,实现资源共享,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具有国家特性的行为

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组成一个复杂的、多中心、互动的全球治理网络结构或“机制复合体”。网络治理模式主要有治理主体复合化、治理结构的网络化、治理机制去权威化、治理体系动态化四个特点。治理主体的复合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全球治理的多样性与有效性,但同时也容易造成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的现象。在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下,各治理主体的相互依赖性增大,但单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有限。治理机制去权威化可能导致治理过程中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决策者,由此也产生了治理碎片化的问题。

上述提及的全球治理理论大多建基于“原子说”的经典本体论基础之上,其认识论基础也往往是呈现二元对立的、主客观分离的知识结构。和合治理理论虽然仍然重视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来思考全球治理,但是和合治理始终坚持从单元主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类主体”,以“类价值”为出发点,追求人类整体的最大利益;而不是把事物从关系

中剥离单独认识和分析,把单元利益与人类命运和总体利益相分割;从而摆脱以民族国家为思维起点来思考世界秩序与全球性议题的局限。和合治理的理论提升体现在其本体论转型、认识论升级、方法论拓展上。

首先,和合治理理论以关系主义为本体论。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融合性、总体性的视角,不仅能较好地超越不同行为体、议题、元素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而且能较好地避免陷入“物化”和“二元对立”中。关系主义本体论与量子本体论所主张的“整体不可分解为部分”相契合,从而强调人类的不可分离性。“关系性”与“和合性”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与准则,进而坚持“合作性”与“社群性”对人类来说具有先在性质。关系主义本体论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超越全球治理中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矛盾以及集体行动的难题。

其次,和合治理的整体关系主义认识论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尤为深刻。和合治理更多地看重“关系理性”而非“个体



理性”，更多地遵循互助逻辑而不是自助逻辑。关系理性有两个重要原则：互相伤害最小化和相互利益最大化。前者是共在关系的必要条件，避免最大限度的风险，这在理性上明显优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互利益最大化建立在人们高度相互依存的前提之上，优于单纯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体关系主义并不是忽视对个体的研究，也不否认个体的作用，而是将个体置于场域中来研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将个体置于集体行动中来考察。

第三，和合治理所采取的“和合中庸适然性方法论路径，致力于促进多元主体之间协调、平衡的发展，注重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恰当分配，不采用极端的方式，更是拒斥搞“小圈子”“阵营对抗”“强制性外交”，强调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要以“和”为目标，推行“维和”“保和”“促和”式外交。和谐是协调基础上的和谐，协调是以和谐为目的的协调。因此，和合治理准确地把握了全球性威胁挑战下全球合作的关

键，有助于消解西方式全球治理导致的紧张、对抗、冲突以至战争的消极性。

和合治理直接回应超越全球治理困境的现实诉求，分析治理主体的行为动机，探索治理主体之间的最优状态，创新治理类型，探索实践路径。和合治理注重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塑造与重建，倡导各主体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发挥各

治理主体的优势以促进一些凭借单个主体难以解决的议题的有效解决。其核心要义是在不同的治理情境中构建不同的关系模式以凝聚共识、促成统一行动。和合治理不仅是一种动态性、整体性、互动性的“场域化”治理，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上不断完善优化。相较于其他全球治理理论（见表

表2 全球治理理论各流派比较

全球治理理论流派	治理情境	治理主体	治理类型	合作驱动力	治理特征
新现实主义全球治理理论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为获得权力而斗争	国家	霸权治理，即霸权国或领导者以本国为优先，同时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	物质与权力	治理行为体的排斥性、治理结构的单向性、治理过程的封闭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独霸性
新自由制度主义全球治理理论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各国相互依赖	国家、非国家行为体都是主要的治理主体	制度/规则治理，即强调国际制度、惯例、规范在全球治理中占据的重要地位	制度与规则	治理行为体的兼容性、治理结构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相对开放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相对公正性
建构主义全球治理理论	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是观念的分配，体现的是各个国家所达成的观念共识。国家之间不断互动，相互建构，国际环境也在不断演化	国家、非国家行为体、行动网络、议题联盟都是主要的治理主体	规范治理，即强调规范在塑造行为体利益、偏好；影响行为体采取的手段以及构建国家利益与认同的重要性	观念与认同	注重主体之间协商；在互动的过程中对身份、利益进行重塑
元治理理论	当前治理网络不能克服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导致治理失败	政府、社会组织、市场机构、公民等多元主体	一主多元治理，即混合政府、市场和网络治理三种模式，但又强调政府在其中的首要垄断地位发挥其特有的协调能力与平衡能力	政府的领导力与权威	通过融合、统筹不同治理形式以减少治理失灵的程度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元主体相互依赖并具有相互协调的合作性，能讲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等	多中心治理，即各个主体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时候形成一个由多权力中心组成的治理网络和合理的决策机制；强调公民参与	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及各自对利益的追求	治理行为体的包容性、治理结构的多元分散性、治理过程的局部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相对公正性
网络治理理论	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环境充满着复杂、多变、多元的威胁	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等	复合型治理，即多元主体组成一个复杂的、多中心、互动的全球治理网络结构或“机制复合体”	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信任、博弈与互动	突出治理主体之间关系的互动性；强调治理向度的多元化与治理结构的弹性。网络治理是一种共同治理的模式。在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编织的合作网络
和合治理理论	非传统安全威胁频发，人类社会进入到深度全球化的阶段。整个国际社会是去中心、去等级化的；世界互联共在且有秩序	除国家以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非政府组织、知识、专家、技术等也成为治理主体	关系治理，并不固定于一种治理类型，而是根据主体之间的互动频率、互惠类型以及发展认同划分为和合体、聚合体与竞合体单中类型	威胁的不确定性与其关系理性	以天下为观照，以关系为本体，以和合为最终目标。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治理过程的多元参与，治理成果的共享。凸显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动态性、多元性与合作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2)，和合治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合的、互补的视角。

当然，无论是受国际关系理论影响的传统全球治理理论，亦或是近年来逐渐发展的新兴全球治理理论都只能从某一个视角为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提供帮助。同样，和合治理理论也不能完美地解释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亦无法超越全球治理的所有困境。但和合治理仍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维、新方案、新路径的重要理念。

## 五、和合治理的实践贡献

在和合治理的理论指导下，如何超越全球治理的实践困境以开拓新的全球治理路径仍是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中国做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创新方案为和合治理的实践提供了具体的路径。事实证明这些创新方案不仅体现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探索，而且确实不同程度上为超越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提供了良好范例。

### （一）和合治理类型

该类型治理体以“天下”为观照，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以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消解因主权问题而带来的紧张与冲突，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视角思考与解决全球性问题。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先后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同时也是该理念的践行者。在全球治理议题中，中国始终坚持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将会进行系统性的改

革，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中国始终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事关人类共同命运，必须做气候治理的行动派，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2016年，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正式提出并获得域内各国正式认可，成为已经进入建设日程的多边命运共同体。澜湄地区有着更好的市场需求和经济合作基础，领土争端、恐怖袭击等区域风险也比较少。随着该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逐渐增多，如非法武装袭击及抢劫事件、人口贩卖、跨境毒品、武器走私等，该流域开始联合安全执法与巡航行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还积极塑造“澜湄精神”、培育“澜湄”意识，促进理解与包容，以确保合作的长久性与持久性。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澜湄国家相互支持，充分体现了共同体意识与澜湄精神：当疫情在中国暴发后，湄公河国家官方和民间机构以不同形式捐赠抗疫物资，提供支持与帮助；疫情在湄公河地区蔓延后，中国及时分享防疫经验、技术；无偿向湄公

河五国提供检测试剂、口罩等抗疫物资。2021年,王毅先后访问缅甸、越南、柬埔寨,与湄公河国家领导人和外长举行多双边会晤20余次。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先后通过《关于在澜湄合作框架下深化传统医药合作的联合声明》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复苏计划(2021-2023)》等共识文件。面对西方国家不断质疑、污名化中国,湄公河国家坚定的支持中国,反对将疫情污名化。2017年以来,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合治理原则,先后与老挝、柬埔寨、巴基斯坦、缅甸这四个国家建立起双边命运共同体关系。只有当各国真正做到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思考全球议题的时候,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冲突,相对主权与绝对主权的冲突才能迎刃而解。

## (二) 聚合体治理类型

该类型治理体旨在重塑、创新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并以关系理性为基础,构建内生性合作机制,解决集体行动难题,探索真正的多边主

义。

西方理论认为解决集体行动难题需要大国引领合作与主导,这是因为个别大国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更多,因此,愿意为集体行动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出现大国不支持那些对自己不利的集体行动。而和合治理以“类群—和合”与“宇宙—和合”两个假定为基础,激发各主体内驱力,促成集体行动并构建一种长效的内生性合作机制。1997年,因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危机感为多边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从而促成了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此后推行的睦邻外交政策,使相关国家之间的多边合作具有了比较高的内部政治互信,外生性合作逐渐转变为内生性合作。至此,区域性多边倡议开始在亚洲激增。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倡导者、维护者和推动者。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并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域外大国。这

也促进了日本、韩国不断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中国凭借关系本体论的和合文化观念,不断推动东盟在价值层面和规范意义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这种内部性提供的共存与合作的诱惑要大于敌对的诱惑。通过多边合作机制,每个主体的利益都能获得改善,从而形成一种互助、互惠的氛围,以保证多边合作的持续存在,不断促进聚合体治理向和合体治理的转化与升级。

2001年6月,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接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正式成员,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将中亚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化。中国在启动、促进和制度化区域多边合作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先后建立了地区反恐机构,协调反恐、情报共享和地区安全方面的多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多边合作已经从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到跨境犯罪、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缓解了三股势力的威胁,促进了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上合组织强调互利、互信,加强凝聚力,提升行动



力。同时，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区域是世界文明多元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也是民族文化差异性最突出的地区之一。但是上合组织坚持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入手，构建相互理解、尊重的氛围。这一区域性多边合作机制所形成的“聚合体治理”类型，不仅超越了“文明冲突”、零和博弈的传统国际合作理念，也开创了冷战结束后的新型国际合作机制。

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是全球跨区域合作与南南合作模式的一种创新，为发展中国家间协同发展、自力更生、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与平台。更重要的是，中国首创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金砖+”的聚合关联与开放合作形式，摒弃了“大国俱乐部式”的“多边主义”，不断拓展与更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惠合作。如2013年，金砖国家同15个非洲国家领导话展开对话，探讨双方开放合作的新路径。2014年，金砖国家开始构建与拉美国家合作的新框架。金砖合作机制要推动金砖五国与现有多

边、区域合作机制平台进一步互动。通过“金砖+”合作框架，加强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扩大“朋友圈”。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被纳入“金砖+”的合作框架中，以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聚合多元主体，搭建多种渠道，激发私营企业、跨国公司的投资积极性，为沿线合作国家及全球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截至2021年底，中国已与全球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除此之外，中国发起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21年10月，已批准147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超过289.7亿美元，惠及31个域内外成员。同时，丝路基金的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推动创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新型发展和融资机制。2019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拓展多边推进的新路

径，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直接对接，成为了促进全球发展的重要方面。

不论是“东盟+”机制在共同发展上寻求最大公约数，还是上合组织在解决共同威胁上找到最大公约数，都促进了内生性合作，为各方提供有效的互动框架。不论是开放、包容的“金砖+”机制还是倡导平等发展、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都体现出中国对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努力与探索。

### （三）竞合体治理类型

该类型治理体主张异中求同、通过良性竞合消解异质性冲突，并消解因西方霸权秩序中的权力观念与排他意识而造成的紧张与对抗，最终向和合状态推进。

在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的竞合关系一直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以敌我分明、对抗冲突、零和博弈为主要特征。而中国一直致力于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则是一种具有超越性、平等

性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指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展开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独立自主的国家合作关系。以中美关系为例，尽管美国用冷战思维把中美关系定格于“战略竞争”关系之中，但中国明确反对这一定位而更多地强调中美是“良性竞合”关系，并努力细分竞争与合作领域，拓展可能的合作，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性机会，解决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所面临的问题。如中国与美国由于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坚实的合作基础，因此不可能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状态。此外，两国可以加强在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用建设性方式处理敏感问题，面对冲突与摩擦，通过沟通保持信任、减少误判。新型大国关系摒弃了冷战思维，有效减少了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拓展了合作空间，借鉴不同文明与制度的优势，相互促进、相互启发，理性看待矛盾和分歧，将其控制在一定的程度，通过密切沟通与互

动，释放善意、减少敌意。

竞合体、聚合体与和合体是全球治理共同体的三种形态，也是有效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三个层次。从竞合体转向聚合体，再由聚合体升华为和合体，不仅需要共同体内部成员互动（既包括直接交流有包括以全球治理议题、治理活动等为中介的间接互动）的增加，也需要增强情感联系，即共同体成员对彼此和共同体具有的情感需求与情感满足，也需要共同体成员行为方式的趋同、文化相似性的递增以及一致行动的达成。在和合体中，成员更容易能够在一定的目标导向下形成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从关系结构来看，和合体中成员间关系更为紧密、等级差异更小，而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也更强。而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的强弱也将直接关系到共同体对成员的约束力与影响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和合治理不仅仅停留在价值理念的层面上，而且在实践层面上已有崭新的表现。中国在不

断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践行和合治理理念，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全球治理制度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力量。

## 六、结语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再次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领域，都弥漫着“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现象。有人认为，这是“全球化的逆转”“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挫折”，表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思维仍旧延续至今，使得全球化进程在世界各地遭遇不同程度的矛盾、阻力，最终将导致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之间形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信任鸿沟。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也向人们生动地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率作用与推动世界各国共筑抗疫防线的努力让更多人认为，这可能是“深度全球化”“再全球化”的开始，是一种“选择性全球化”的到来，是“替

代型全球化”向“互补型全球化”的回归。在如此激烈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传统中的和合文化和天下情怀拥有了得以发扬光大的全新条件。

本文试图探索既能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而又能影响世界的全球治理理论，即和合治理理论。无疑，和合治理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哲学精神，是一种能够包容更多主体、族群、文明并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和合治理”摆脱了从单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来考虑问题的认识局限和全球治理的建构模式，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为思考基点，协调各个主体之间的共存与合作，其本质是优化、整合国际社会的多种力量与元素，从而实现全球公共福祉和全球公共利益。同时，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已经在实践过程中衍生出“和合体”“聚合体”“竞合体”等治理类型并为全球治理的变革路径提供了诸多启示，为全世界确立治理的榜样。2017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同年9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起被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中。这预示着中国可以更加自信、更加成熟地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与贡献者，也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当前，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等大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际合作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人们改善生活的能力。尽管“和合治理”是应对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冷战思维的一种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的探索，但在一定程度上，“和合治理”只是一种理性规范性理论，只能解释各国在采取理性选择时的行为，不能解释他们在采取次优选择时的行为。然而当国际社会共同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达成对全球和合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致认同时，我们必然能看到“和合治理”时代的真正到来。

编辑：王星懿





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从广义安全论视角，围绕安全熵与安全算法，研究人类安全的历史演进与算法升级，具有特别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人类共同体生存方式的扩展，决定了以不同共同体为单元的安全算法演化，进而形成了安全算法“升级”的总体历史轨迹：从战争算法、竞争算法、竞合算法、和合算法不断迭代而趋向上升，其总体特征是安全算法不断从基于暴力或结构性暴力的战争或竞争向基于非暴力的竞合与和合“升级”。不同类型安全算法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功能与具有的重要特征不同，但和合算法较之其他几种安全算法更具正向价值导向。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和合算法”成功的重要范例，从而为人类安全算法的“升级”提供了榜样。人类安全算法的迭代和升级不是线性的，国家对安全算法的选取也往往不是单一的，但算法的“升级”总体上凸显了人类和合算法所具有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 余潇枫： 人类安全算法“升级”：战争— 竞争—竞合—和合

在什么样的安全语境下，国家选取何种安全算法最具合理性？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与模糊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价值立场（安全指涉对象的确定）与智慧水平（安全维护方式的选取）。国家安全维护的实质是对人的价值的维护，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才能更好地塑造世界的普遍安全与人类的永久和平。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人类社会的生存法则，还是国际关系的安全算法，都有其价值取向。正向价值导向的安全算法可以给人类带来合作与共赢，反之则会带来冲突与灾难。因此，从广义安全论视角，围绕安全熵与安全算法，研究人类安全的历史演进与算法升级，具有特别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在诠释安全熵与安全算法概念的基础上，对人类四种安全算法类型进行了纵

向的考察与特征概括，对传统安全算法与非传统安全算法作了解析，继而阐明了人类安全算法“升级”的基础与成功范例，并对人类安全算法的未来作了简要展望。

## 一、安全研究新视角： 安全熵与安全

算法安全熵与安全算法范畴的引入，刷新了国际安全研究的传统视角，让安全研究进入

了更为广义的层次。把握安全熵与安全算法的内涵，考察人类安全算法的迭代升级，不仅有重大的方法论建构意义，而且有拓展理论解释性与实践引领性的哲学意义。

### （一）不安全是“安全熵” 增大

“熵”是关于系统秩序状态的一种测度，即系统秩序的和

合度或混乱度。系统秩序混乱度增加，被称之为“熵增”，系统秩序和合度增加被称之为“熵减”或“负熵增加”。物理学界定“熵”为“热能除以温度所得的商”，特指热量转化为功的程度。热力学诠释“熵”为：孤立系统内热量总是不可逆转地从高温流向低温，从和合有序走向混乱无序。因此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能量守恒”不同，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热熵定律”）为“熵增恒定”。机械能转化为热能产生“热熵”，分子热运动的混乱无序度即为热熵，因而系统演化是和合有序还是混乱无序，或熵增与否，取决于有无外部能量输入；一个系统变得和合有序，必有另一个系统更加混乱无序，且无序的增加程度将超过有序的增加程度。

把熵与安全关联起来考察，“熵增”或“安全熵”是不安全，“负熵”才是安全的指称，不安全遵从“熵增恒定”的“熵定律”。“安全状态的存在和维持是随机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因而，保障安全的条件是相对的，只限定在某个时空

中。如果条件变了，安全状态也会发生变化。安全的这种不确定性，引出了安全熵的概念，使得‘熵’（或者‘负熵’）成为了研究安全的重要手段”。因不安全因素的随机性，“安全”具有不确定性与相对性。如若和合状态的共享秩序被解构，因秩序失衡导致系统增加的“无序度”“混乱度”就是“安全熵”。

那么如何概括“安全熵”的特征并判定系统“安全熵”的大小？由于不存在绝对的安全，随机涨落是系统演化的直接诱因，总会有某个不安全因素引发系统A的不安全事件，这表明“安全熵”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非负性（没有绝对的安全）；二是对称性（安全熵取值大小与不安全因素排列次序无关）；三是不确定性（如确定已知唯一的安全威胁来自何处，一般来说就不再有问题了）；四是极值性（引发不安全事件的概率相乘时，系统A的熵达到最大值）。可见，安全的和合度与有序性越高，即不确定性越低，系统就越安全。

## （二）安全算法：安全负熵增加的“演算法则”

“安全算法”（security algorithm）的引入对安全与不安全（即“安全负熵”与“安全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算法即“计算方法”“演算法则”，是用以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系列步骤或“逻辑化演算法则”。“逻辑化”一词表明：算法既可以用数学算符表达，也可以用逻辑语言表达。也就是说，算法不唯是计算科学的专门工具，也可以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工具。算术中的加、减、乘、除以及几何学中的推理法则都是算法。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与人工智能的研究，为现代算法开创提供了普遍的可能，计算机通过运用人的思维过程的形式化方式，助人摆脱大量重复性、机械性的繁琐推导与计算，并通过算法迭代提高解决问题的演算能力。算法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有序性，执行有限步骤后算法必然终止；二是确切性，算法每个步骤必须确切定义；三是可行性，特定算法可以在特定时间内解决特定问题。

从安全上理解，算法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生灭的种种演化法则，而安全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算法。如果把人看作是基因的“生存容器”，那么人类演化都是基因算法所为；如果把人看作是微生物群落的“聚合星球”，那么人的众多行为都是微生物算法所至；如果把人看作是“生化机器人”，那么“人类的想象力也一样只是生化算法的产物”；如果把人看作是有生命活动“自我否定性”的“类存在”，那么人的本质的“后天生成性”则是“自由意志”的算法所由。对人类来说，安全算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逻辑化演算法则，是人的安全思维过程的形式化表达。当然，人作为具有类特性的“类存在物”，有着其呈现自由意志的生存算法。首先，人的类特性与物的类属性有着根本区别。物的类属性是固有的本然性，是一种限定性的概念，而人的类特性是一种超越性的概念。其次，人类的类特性与动物的种特性也有着根本区别，类特性正是基于对种特性的否定而生成的。种特性刻画的是动物的存

在属性，即本质先定性、无个体性、与生命活动的直接同一性等，类特性刻画的是人的存在属性，即本质的后天生成性、个体性、生命活动的自我否定性等，“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安全算法一旦形成，就会以系统整体的强大驱动力驱使人在不同的安全情景中，重复运用该算法而实施具体的行为。“有了文字之后，人类就能组成网络，每个人完成巨大算法里的一小步骤，而最后的重要决定由整个算法来判断。这正是官僚体系的本质”<sup>a</sup>。因此，人类从游牧时代经过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演进，总是伴随着生存算法的持续升级。同样，国家之间从暴力对抗到非暴力竞争、互利性竞合、共享性和合的演进，也都可用安全算法的迭代升级来刻画与描述。翻开人类历史一幅幅地图可知：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演化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世界也由此不断地被重塑，而国家、地区、世界不断被重塑则离不开安全算法的迭代升级，人类安全算

法显现出的“改造性全球效应”与“累积性国际效应”在不断“塑造和重塑国际体系”。可见，安全算法是人类提升自身生存方式与文明档次的关键所在。

## 二、人类安全算法四种类型

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变迁与人类安全算法的迭代更新、不断升级紧密相关，无论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往往都是安全算法冲突与融合使然。根据人类历史演进的脉络，人类安全算法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种类型：战争算法、竞争算法、竞合算法、和合算法，并在宏观尺度上呈现出不断迭代升级的趋向。

### （一）人类安全算法的历史演进

据人类学家考证，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只有一万多年，而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百多万年前，早期的人类大多以4—5人为一个小群体、几个小群体为一组群落的“微型共同体”方式生活。但是那时，“群—群”之间的交往方式是不理想的，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



“贸易”的方式，在今天看来都是不甚道德的“你死我活”。“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社会有100万个左右。每个社会都是一个不对外来者开放的群体，一个成员愿意为之而奋斗的群体，有时他们甚至也愿意为之牺牲。每个社会都获得其成员的强烈认可，并且这种认可是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存在，并代代相传的。但直到千年以前，所有这些社会都是狩猎 - 采集者组成的小型社会”。为此，“战争算法”是早期人类最主要的生存法则，并且直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该算法一直被优先采用，尤其“作为近代军事政治的发源地，欧洲国家曾相当迷信和滥用武力。西欧列强侵略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便是一部以武力攻破长城、用血与火洗劫不发达国家的史书”。

随着商业普遍兴起，人类安全增加了“普遍竞争”的维度，竞争算法开始与战争算法并举，并逐渐扩展其领域，直到成为国际关系的一大算法。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强权国家往往是两种算法

混用，但逐渐转换了两者的次序，从“军事开路、政治主导”的暴力干涉，慢慢地转向了“政治先行、军事殿后”的路线图。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全面开启，国家成为世界众多经济行为体中的一个，竞争取代战争更具现实基础。但国家利益不像政治、军事领域那样能清晰界定，经济威胁又不能轻易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经济能力与军事能力相关联并决定军事能力，经济实力与国家实力相关联并决定国家实力。于是，“竞争算法”逐渐上升为国际关系中优先采用的安全算法。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推进，进一步开创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新景象。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创造出国家之间共生、镶嵌、互构的现实，使得“竞争 + 合作”成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主要安全算法。人类开启了较之战争与竞争更高维度的“竞合”时代，商业中最先开始运用的“竞合算法”也升级为第三类型的人类安全算法而进入历史。

基于人类工业化 - 现代化 -

全球化 - 深度全球化”的历史发展逻辑，相互紧密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方式成为现实。经济一体化、社会网络化、文明共享化、风险互构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方式表明：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共同家园，万物互联共生，安全不可分割。“当今的任何力量，包括所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思想和行为，都无法将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流动，拉回到历史那种社会之间的隔离的状态”。加之中国和平崛起，把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保合太和、万国咸宁”的安全理想，“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中国式安全道路，“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中国式普世精神向世界传递。在这一语境下，“和合算法”再次使人类的安全算法超越以往而升维”。

## （二）人类安全算法基本类型

人类有关安全的研究，必然涉及对安全算法因子的研究，五大算法因子是任何安全研究必须弄清的基本问题：谁

的安全？什么威胁安全？谁来维护安全？如何维护安全？安全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基础是什么？安全的指涉对象即“谁的安全”问题，是统领其它所有问题的元问题，“如果没有指涉对象，那么就将没有安全的威胁与安全的讨论”。安全的本体寻求即“什么威胁安全”问题，是应对安全的前提问题，如果本体寻求有误则难以超越安全困境的逻

辑。安全维护主体即“谁来维护安全”问题，是由安全指涉对象派生出来的问题，如果安全维护主体错位则安全维护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安全方式即“如何维护安全”问题，是实现安全的基本保证，如果方式运用不当则会造成安全维护初衷的背反。安全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即“安全范式”的理论基础问题，如果理论基础错置则会导致安全目标选择、安全指涉对象确定、安全治理主体选取、安全治理

原则立场与方式方法采取等一系列失误。

基于五个安全算法因子的研究成果，安全算法的表达式可以概括如下：

$$\begin{aligned} \text{安全算法} &= \text{最简约演算原则} + \text{最可行操作方法} \\ &= \text{简约原则} + \text{可行方法} \\ &= \text{原则} + \text{方法} \end{aligned}$$

按这一表达式，人类安全算法类型及特征列表如下：

表 1：人类安全算法类型

	指涉对象	他者	安全本体	主导范式	原则	主导方法	安全熵
战争算法	国家 + 政权	敌手	客观实在	现实主义	独霸	暴力夺取	最大
竞争算法	国家 + 社会	对手	客观实在	自由主义	独享	强力夺取	较大
竞合算法	国家 + 人民	伙伴	主 - 客实在	竞合主义	兼享	实力获取	较小
和合算法	人类 / 人民 + 国家	同伴	关系性实在	和合主义	共享	合力获取	最小

辑。安全维护主体即“谁来维护安全”问题，是由安全指涉对象派生出来的问题，如果安全维护主体错位则安全维护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安全方式即“如何维护安全”问题，是实现安全的基本保证，如果方式运用不当则会造成安全维护初衷的背反。安全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即“安全范式”的理论基础问题，如果理论基础错置则会导致安全目标选择、安全指涉对象确定、安全治理主体选取、安全治理

根据表中所示简化后的人类安全算法公式概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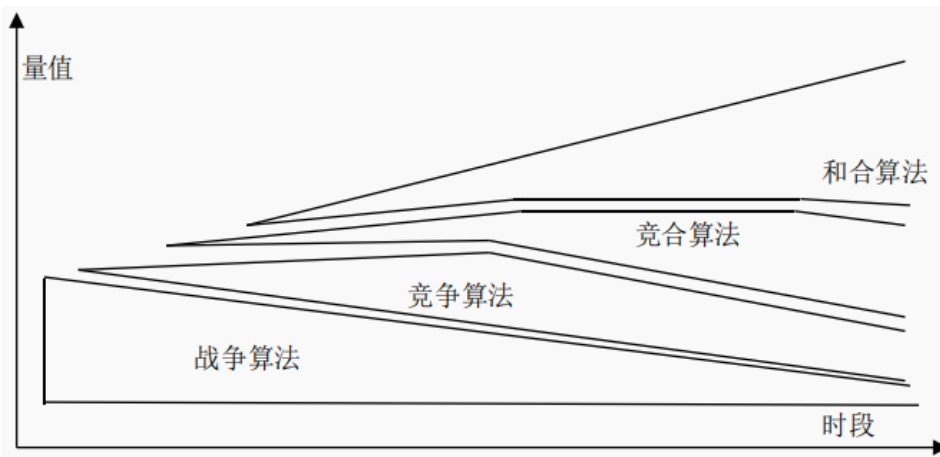
$$\begin{aligned} \text{战争算法} &= \text{独霸} + \text{暴力夺取} \\ \text{竞争算法} &= \text{独享} + \text{强力夺取} \\ \text{竞合算法} &= \text{兼享} + \text{实力获取} \\ \text{和合算法} &= \text{共享} + \text{合力获取} \end{aligned}$$

从人类的历史演进即从部落、部落联盟、国家、国家联盟、超国家共同体且正走向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来看，

人类有“共同体演进”的明显特征，根据冲突与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画出不同安全算法的迭代趋向示意图：

图 1 表明人类总体上在“战争 - 竞争 - 竞合 - 和合”的不同阶段越来越向和合度增加的方向发展，证明趋向和合是必然的历史走向。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早期，战争往往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人类在经历了两万多次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进入非暴力极端形式为主的竞争阶段。随之冷战以非战争方式结束，欧盟的建立消解了“边境困境”，东盟的努力又使亚洲进入五十多年的“协商式和平”，人类目前处在了以“竞合”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中国、欧盟为代表的“和合”方式也开始对人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积极引领作用。

但对于某一地区或国家，其安全算法迭代的样式与进路因不同国家的博弈策略不同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战争—竞争—竞合—和合”之间不排除有交叉重迭。在不同历史阶段、



战争为主阶段 竞争为主阶段 竞合为主阶段  
和合为主阶段

图 1：人类安全算法的迭代趋向

不同地区与国家间，往往有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循环，还有战争与竞争的循环、竞争与竞合的循环、竞合与和合的循环等。如苏联在仍然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背景下放弃战争算法而选择结束冷战，这表明“领导人的战略选择可以终结制衡”并且“冷战的终结及其结束的方式对均势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学理挑战”。人类安全算法的演化也不排除在政治博弈中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虽然所有负责的人都会同意核战争会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但“核战争可能被发动，不是因为哪一方认为它可能会赢，而是因为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即将发动袭击”。事

实上，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俄罗斯对战争算法的再次选用，并“向北约发出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核威胁，美军的核武库现代化也加速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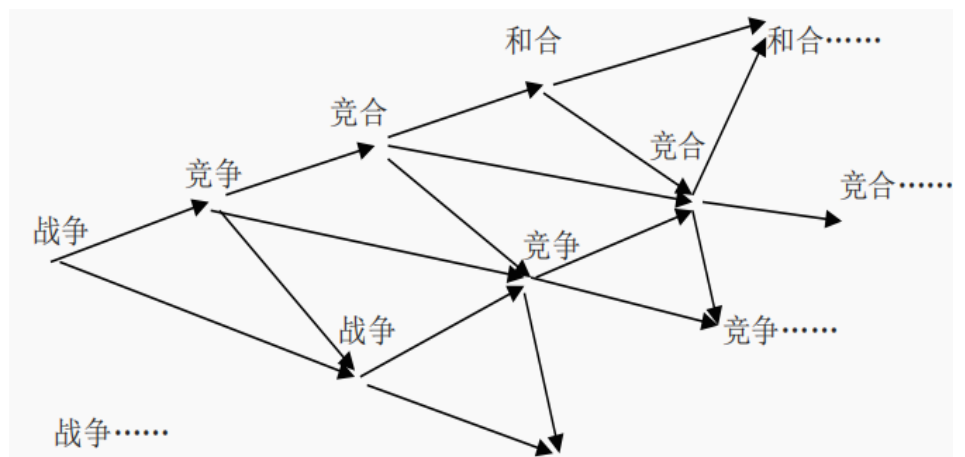


图 2：安全算法博弈走向图

使得过去被认为过时了的那种冷战式的传统军事威慑正在加速回归”；另外，人类战争次数的减少并不意味着战争烈度也降低，两次世界大战的烈度

就令其他局部战争无可比拟，如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恐足以毁灭人类自身。故安全算法总体上的演进趋势并不排除“安全黑洞不安全奇点的出现可能，从而使趋势波折甚至短时反转。然而，这并不影响人类社会的“类安全”总体趋和以及不断整合为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走向。反对战争以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永远是人类的首要目标，“广义安全”是随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并从冲突走向和合的。这样可以简约地画出以战争作为起点假设的按时序扩展的博弈走向图：

以上四种不同类型的安全算法相对安全变化门槛和临界点方式各不相同。战争算法导致的不安全是“爆炸型”的，即突然地将系统从一种状态迅



速切换到另一种根本不同的状态；竞争算法导致的不安全是“连锁型”的，即使系统在一段时间内从初始状态一步步转入某种性质不同的状态（如经济萧条等）；竞合算法导致的不安全是“失调型”的，即使系统随着关键变量的失衡而经历转型式的变化，如“良性竞合”转向“恶性竞合”，甚至转向“恶性竞争”。和合算法是正向“修复型”的，在理论上是只会导致安全结果的算法，如果有意外的“不安全”，那多是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而陷入“安全乌托邦”（securitopia）的本体论陷阱。

### 三、人类安全算法解析

国际关系的演进离不开安全算法的演进，国际安全的塑造离不开安全算法的塑造。因此，四种不同安全算法的形成条件与表现形态需要作进一步解析，以明了这些安全算法的具体特征与社会功能，以及与人类历史演进、国际关系变迁的“互构作用”。

#### （一）战争算法

运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获取资源的安全算法称之为“战争算法”。战争是人类野蛮无知的象征，是人类告别动物世界必须经历的“血腥阶段”。如果人类文明从人类诞生时算起，那么战争常被视为“文明生成”本身，甚至“一旦诉诸暴力的期望在社会上盛行，不论是国内战争还是国际战争，不论是必要的‘战争’还是出于权宜之计的‘战争’，都会成为体现我们文明进程的特点之一”。从安全角度看，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战争与冲突史。以战争为例，有学者大致估计：公元前3600年至今的五千余年间，只有292年是和平的，全世界发生了大约1.45万场战争，共有近35亿人在战争中死亡。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也几乎每年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家不同程度受到战争的影响。再细看一组数据：“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战争与资本主义》中指出，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100年；在16世纪，

欧洲只有25年太平时光，而这一数字在17世纪缩短至21年。也就是说，在这两百年里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欧洲列强在1494—1975年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策动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间不超过25年”。总之，“最近50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所谓的主要列强与那些伺机打败他们、夺取他们海上霸权地位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写满了这部历史”。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从拜占庭—波斯战争到十字军东征，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到五次中东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在制造、销售并使用武器”。即使进入有“工业文明4.0版”之称的21世纪，人类仍难从战争威胁和核灾难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在战争算法的支配下，战争中的行为体形成强烈的“自者”与“他者”的

区分。温特在分析霍布斯无政府逻辑时指出，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全生命，是杀戮或被杀”“在这种体系中，行为体不能求助于其他行为体，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赖于军事权力，安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安全困境十分尖锐。这种结构产生了四种趋势：一是常年不断的无限战争；二是消灭‘不适应’的行为体；三是国家强大到不至于被消灭的地步，就会制衡相互的权力；四是霍布斯体系趋于把所有体系成员全部拖入战争状态”。

在战争算法支配下，人类战争随着武器从冷兵器向热兵器、热核兵器、智能兵器转变，也导致战争模式从“对杀”“超杀”“滥杀”向“混杀”转变。首先，以“对杀”为特征的战争，是一条奇怪的三位一体的“变色龙”：盲目的自然冲动，自由的精神对抗，纯粹的政治工具。战争催生了国家军事化，催生了“制造战争”与“建构国家”的共生效应。历史上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确立几乎就是一场战争的

结果。其次，以“超杀”为特征的核战争，比“野蛮社会”更“野蛮”，暴力强度远大于以往，甚至可能毁灭人类。再次，以“滥杀”为特征的恐怖主义战争，通过对无辜者的暴力伤害、向复仇对象实施报复，是极端恶性式的“变态复仇”，是“战争”在当代的另一种新形式，是造成灾难后果的“非对称战争”。最后，是以“混杀”为特征的“混合战争”。这种战争既有枪炮交射、导弹横飞、战机奔袭等军事较量，又有网络战、经济战、能源战、粮食战、金融战等非军事交锋；既易引发油气断供、粮食短缺、金融危机、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等飞来横祸，又会造成生灵涂炭、难民如潮、家园尽毁等人道主义灾难，是具有超限性的全维战争”。

为了适应“战争算法”，国家会奉行军事至上战略。如斯巴达全民皆兵，以尚武为国家的灵魂；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为国家强大的象征；又如冷战时期的美国，把国家建设成强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所以“战争

算法’呈现的是霍布斯文化的敌手共生”，其算法原则是“独霸”，方法是“暴力夺取”相关国家的资源。

## （二）竞争算法

人类早期之所以战争算法通行，是因为人类的生存方式还局限在比较小且各自为政的“共同体”中。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国际体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大大加强，使得战争算法占主导的“分”强于“合”的国际政治体系地位减弱，且形成了促成竞争算法占主导的“合”强于“分”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说，资本主义成长壮大的必要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式全球经济运行的政治表现，就是政治权力分散导致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由此引发生存权竞争和市场财富竞争相融合，并进一步导致普遍不安与恐惧的“实力-安全困境”。至少，“尽管分工带来的贸易、投资与经济相互依存，并未像19世纪初和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能够阻止战争，但是，它或多或少地终止了当时为了

强化物质优势而发动的战争”。但直接的暴力现象消除了，以暴力为后盾或通过“结构性暴力”获取资源仍是竞争算法的重要特征。

如果说战争算法的原则是独霸，方法是暴力夺取，那么竞争算法的原则是“独享”，方法是强力（超强实力）夺取，其根本区别是从不相容博弈转向相容博弈。国家之间的竞争体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方方面面，统合起来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资本主义是一种竞争体系，其活力依赖于市场上的各种威胁、脆弱性、机遇的相互作用。当竞争意味着失败的危险无时不在时，居于此种环境下的任一行为体怎能期望自己拥有实质性的安全呢？可能存在的只有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也就是说，竞争主义的安全算法与战争主义的安全算法形成了重大区别，绝对安全的追求更多地让位于相对安全，暴力夺取资源更多地转向非暴力获取，战场中的武力更多地被市场中的强力替代。于是，“暴力隐没在背景之中，而大量的

倡议和规则跃然纸上”。

当然，国际竞争的面很广，除了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如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之间的竞争。这些竞争直接或间接为国家间的利益竞争服务，或本身就是国家利益的化身。但也不排除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会超越“国家本位”走向“无国籍化”，甚至直接消解既有的“国家认同”而将跨国认同和世界主义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福特公司就声称他们的身份是“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公司，在英国就是英国公司，在德国就是德国公司”。故此亨廷顿在研究国家认同时惊呼：关于种族优先权、双语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移民、同化、国家历史标准、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欧洲中心主义等等的论争形成了一场挑战美国国家认同的“战争”。

竞争的非暴力虽然代替了战争的暴力，但国家之间竞争的极端方式则是“非传统战争”，如生物战、意识形态战、金融战、贸易战、资源战、信息战、

质量战、标准战等，这些非直接暴力形式的“非传统战争”广泛发生于国防、金融、生态、能源与科技等领域，其对抗规模、频次与强度呈扩张之势，构成对国际局势与国家社会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的“战争”是一种“非常规战争”，其根本特点是使用各种“非致命武器”，不仅使战争简便、随意、可行，而且给受攻击对象带来深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与各类人道主义灾难。这种“战争”并非领土之争，也非传统主权之争，而是利益安全场域和社会心理安全场域中“软边疆”上的利益争夺与综合国力上的力量消解，甚至可以是受攻击方的全民侵害或代际侵害以达到无形中打败对方的目的。

竞争算法的原则是“独享”，方法是非暴力的“强力夺取”相关国家利益的资源。但安全算法的选取与运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是安全追求者的最佳选择；在其他情况中，竞争则更可能带来安全。信息变量与



物质变量都是合作的关键，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不能单独决定一个国家的战略。国家自身的动机也会影响其战略，在一般条件下，安全追求者倾向于合作，而贪婪国家倾向于竞争”。

### （三）竞合算法

运用非暴力方式展开国家关系以合理地获取资源的安全算法可称之“非传统安全算法”，而其中人类社会新兴起的竞合算法与和合算法特别值得关注。

竞合的萌芽在历史上早已出现，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竞合算法也不乏实例。如早在公元1004年北宋和辽国就缔结“澶渊之盟”，此后两国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战事，双方在某些领域相互开展竞争，又在其他领域保持合作，进而达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某种力量平衡。再以冷战时期的美苏为例，古巴导弹危机后，约翰·肯尼迪产生了一个建立类似“竞争伙伴关系”的想法，认为美苏可以在某些领域竞争，但在其他领域和平相处。他曾在美国大学的演讲中坦言，“我们不能再

发生类似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险情了，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安全世界’”。

冷战以降，随着全球越来越融合为一体，全球安全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保护深度镶嵌。全球性的互动与融合赋予国家行为体一种超越身份角色的关系型价值，即不以身份角色为单一判断标准，而是以全球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具体内容作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关系。巴里·布赞认为全球现代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心化的全球主义”（centered globalism），包括开始时的“西方殖民式国际社会”和后来的“西方全球性国际社会”；第二个阶段是“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 globalism），“去中心化”在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有四层含义，其一是去霸权中心化，其二是去国家中心化，其三是去军事武力中心化，其四是去阵营对抗“集团化”。全球转型的格局不再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支撑全球现代性的权力模式变得更加均衡，也愈发具有融合性特征。如以和平

发展为宗旨、奉行结伴而不结盟外交的中国，以及一批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和平合作与包容互助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再以中美关系为例，尽管美国用冷战思维把中美关系定格于“战略竞争”关系之中，但中国明确反对这一定位，更多强调中美是“良性竞合”关系，并努力细分竞争与合作领域，拓展可能的合作，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普遍的竞争加合作关系最早源起于商业交往关系的深化，恰如韦伯所指出的“重商主义的精髓在于把资本主义工业的价值观引入政治领域，国家仿佛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21世纪前后，“合作场景的变化已经导致了大约5万家全球公司的诞生。全球公司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市场，仿佛民族国家不再存在一样”，他们“既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中获得了好处，又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竞争加合作需要从规范与制度的建立做起，而“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规范和制度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它们被视为

既使不是实力关系或者生产关系附带的辅助品，也是实力或者生产关系的副产品”。其实，新制度主义较早就开始关注以制度促进合作，并以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作为特定制度类别来尝试开展国际“竞合”。

有学者在研究了国家间“竞合关系”后提出“竞合主义”这一范畴，并强调竞合主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储昭根认为，竞合理念是经济学、管理学的第二次观念革命，在世界进入相互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阶段，用竞合主义新范式来思考、解读国际关系十分必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国际关系理论，因此“竞合主义比新自由主义有着更多元的视角”“竞合主义还能解释国际、国内政治相互影响的问题”“竞合主义不仅认可国家是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同时也承认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或作用”。竞合算法的原则是“兼享”，方法是“实力获取”相关国家利益的资源。因此，以竞合主义为理论范式的

“竞合算法”运用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互动的重要方式。

#### （四）和合算法

随着深度全球化的展开，安全领域更多地呈现出安危不可分离的“一战俱损”“一和俱益”及合作共赢的时代境况，主权必要让渡、暂时搁置主权、倡导责任主权等成为跨越国家边界合作的重要价值取向。现代性文明已不是国际体系中的某个单一文明，而是多种文明交互复合的多元文明，甚至是如吉卜林《东西方民谣》所写诗句那般“没有了东方，也没有了西方，没有了边界”，“今天的现代性文明代表了已知世界以及不同文明复合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现代性文明现在还保留着领土根基，但该文明也同时被一些非领土进程所定义”。当国家间的合作代替了对抗，和合代替了竞合，世界便进入了以和合为核心价值的共生、共建、共享的新时代，“从竞合状态向和合状态的迈进，是终极安全的体现”。

和合主义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引领性范式之时，和合算

法就将开始成为人类安全算法的主导性选项。和合算法以“共享”原则超越了战争算法的“独霸”、竞争算法的“独享”、竞合算法的“兼享”；所选取的维护安全方式既非暴力夺取资源，也非强力获取资源，也与实力获取资源不同，而是“合力共享”资源。因此，和合算法较之其他几种安全算法更具有正向价值导向，更能获得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实效。

“多元多边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外交探索是国际关系中推行和合算法的重要范例。基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无论是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国际间的多边合作，还是区域间以某种共同体方式开展的合作，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集体行动难题：谁来领导？谁来推进？谁来决策？谁来实施？如果共同推举的领导者握有一票否决权，那么所谓的“多边合作”实质上就成了一种形式上的“多边主义”即“单元多边主义”；如果双边合作只考虑彼此利益，而不考虑双边决策对第三方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溢出性影响，那么这种“双边

合作”也只是一种“单元双边主义”。而“多元多边主义”倡导多元多边合作：这是一种没有某个国家持直接否决权的多边合作方式，是一种在形式上与实质上相统一的“强多边合作”，即国际多边合作基于普遍行为原则与多边制度主义，“它所强调的不是从一个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政策战略，而是从整体角度，即从地区或全球角度强调多边制度结构，考虑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尤其考虑制度性因素对国家之间互动产生的影响”，在必要的时候要求其成员国家在主权问题上作出一定妥协和让步。与以往基于各国外交战略的国际机制合作不同，多元多边合作聚焦于观点的综合性与制度结构的多边性，且以地区和全球视角来优先考虑问题。它所提倡的国家间的互动要求更多考虑国际因素和国家主权的相对让渡，其价值追求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中国提出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与现在‘全球治理民主化’的意思类似，有相通之处”。联合国、世贸组织是多元多边合作的典型类型。中国所发起的上合组

织、亚投行以及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均是“多元多边主义”合作的探索。因而，真正的多边主义应该是“多元多边主义”，即是一种人类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多边主义”，一种合作中发挥主导甚至领导作用的国家不持有特别“否决权”的合作形式，它体现的是国际关系民主化，追求的是多个国家合作基础上的“和合世界”，而不是两个或多个国家合作中的“一个世界”，这正是非传统安全外交的国际价值与普遍意义所在。

中国践行的非传统安全外交具体形式有：体现广泛民主的“包容性外交”、强调求同存异的“结伴性外交”、预防隔阂冲突的“对接性外交”、促进互动互惠的“镶嵌性外交”、超越强制独享的“共享性外交”等。其中“包容性外交”是一种超越国际社会“拉帮结派”“阵营对抗”的新型外交，重在以和合主义天下为怀的普遍性包容，提倡国家间、地区间合作中的多样化与惠及他国和世界政策的制定；“结伴式外交”是一种超越传统“结盟外交”局限的开放式

外交，通过接触与对话，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国家间和区域的安全合作和安全治理；“对接式外交”是一种超越西方大国“强制性外交”，具有共生互补性质的新型外交，重在异质性文明之间建构对话沟通的桥梁，进行相互对接从而实现相互理解；“镶嵌性外交”重在通过“优态共存”的镶嵌性结构关系打造，为国家间的共同安全与发展提供前置性条件；“共享性外交”是和合主义范式的总体性体现与运用，重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为超越安全孤立“安全自保”提供“安全互助”“安全互保”“安全共享”的新路径。非传统安全外交作为和合算法的具体形式，有利于促进国家间政治上和谐式的建设，经济上互补性的发展，文化上互惠性的交流，从而消解国家利益争端，化解文化宗教矛盾，共同开创人类的持久和平与世界的普遍安全。

#### 四、人类安全算法“升级”

人类安全算法解析得出人



类安全算法不断按文明的价值排序进行“升级”的结论，那么人类安全算法的历史性基础是什么？特别是“和合算法”的本体论前提与不同安全算法的支撑方法论的理论范式又是什么？有何人类安全算法升级的成功范例？

### （一）人类安全算法升级的基础

人类安全算法的不断“升级”凸显了和合算法处于价值排序高端的“合规律性”，那么和合算法的“合目的性”源自何处？任何一个演化系统，根本上都是对立统一、共生交融的“和合体”，“和合”的逻辑原点是“相关各方具有共生性，而共生性首先的含义是相互性、包容性，否则就失去了相互依存的可能”。基于“量子求和”规律（在根本上所有的物质与生命都是以量子的“求和”与“聚合”形成更高级形态的“和合”状态，进而在混沌中造就了无数种类的有序结构）；“生态求和”规律（无论是细胞的共生还是动植物的共生，抑或是人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共生，“和合”是生

态系统整体所具有的本体性特征）；“人类求和”规律（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各有特征，但把历史演进连贯起来，就会发现国家间关系不断从战争走向竞争，从竞争走向竞合，再从竞合走向和合）；可以给出“宇宙 - 和合”“生态 - 和合”“类群 - 和合”三大理论假定，为和合共生设定本体论前提。从而也为和合算法的元逻辑合理性提供理据，如果说“和合共生”是和合算法价值元点的本体论前提与其“合目的性”的源起处，那么和合算法的实质是宇宙万物、地球生态、人类社会演化共有的元算法。

“和合算法”在人类生存共同体不断扩展中展现与升级。人类一切发展都是历史的过程体，历史的进程为人类安全算法升维提供了现实基础。如前所述，人类的生存方式还局限在比较小且各自为政的“共同体”时，战争算法是其主导的安全算法；当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大大加强，国际体系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时，竞争算法是其主导的安全算法；当全球安全与全球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保护深度镶嵌，国家间互动与融合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形成之时，竞合算法是其主导的安全算法；当深度全球化生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家园”生存方式时，和合算法开始成为引领乃至主导性的安全算法。

支撑人类安全算法方法论的理论范式，在国际关系领域大体表现为强调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强调为安全而努力的自由主义、强调观念建构利益的建构主义、强调调和前三者的竞合主义、强调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主义。每一种安全算法的升级都基于理论范式的升级，而理论范式的升级又必然需要对时代主题、世界秩序、国际体系、区域治理、国家主权、民族观念、冲突合作以及国际安全结构性等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世界秩序的理论建构为例，各理论范式不断吸纳着不同民族与国家为世界整体做出的思考与贡献。希腊人的世界秩序观是西方秩序观的开端。希腊人相信万物生灭的背后有一个终极本体“一”，进而

形成作为永恒法则的“逻各斯”(logs)即“宇宙秩序”(universe order)。到了近代,西方传承了希腊的“逻各斯”秩序观,先后产生了帝国体系主导下的“权力秩序观”、结盟体系维持下的“均势秩序观”、一超多强结构下的“霸权秩序观”等,特别是欧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后形成了让渡主权的“一体化秩序观”“共同体秩序观”。印度有其“内省超脱”“善为贵”“非暴力”的价值传承,提出过“国家圈”体系的构想、“不结盟”政策等。伊斯兰基于《古兰经》教义与伊斯兰教的社会理想,提出世界秩序的价值目标是“和平与正义”等。中国有“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和为贵”的文化遗产,认为“天人合一”是世界秩序的永恒前提,形成了以“和合”为价值核心的“文化秩序观”,其历史上形成的东亚封贡体系、当代推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新安全观均为地区安全与世界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由此,和合主义范式诞生于中国自然是地缘文化与理论传承的使然。

## (二) 人类安全算法升级

### 的范例

不同的安全算法中,和合算法是能够使得“安全熵”最小或安全负熵最大的算法。和合算法的原则是“共享”,方法是“合力共享”相关国家资源。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和合算法”成功升级的重要范例。“历史上,中国处于中国中心秩序的中心,该秩序覆盖了东亚以及周边海域的大部分地区。从安全角度看,中国中心秩序成就非凡,虽然不断受到挑战,特别是权力中心崩溃的时候,但是它维持了长时段的平和,尤其是在东向和南向地区”。彼得·J·卡赞斯坦认为,中国崛起是当前最为重要的国际问题,但中国崛起并非是“世界经济事务中的一次根本性突破”或“断裂”,也非是“未来中国将重现历史的辉煌,重返全球主导地位”或是“中国治下的和平在全球的回归”,而是“新旧模式与元素的重新组合”,是“中国的安全政策和东亚的制度化安全秩序中包含着新旧元素的重组”,或是世界通过非线性、多地域、多方向的众多过程的组合的中国化”。外界很多友好人士很

想知道“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之后的意图。……中国要建构什么样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中国能否通过提供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理念而获得安全和权力?其他国家会接受其合法性吗?”。中国践行“和平崛起”发展方略,实行“维和”“促和”“保和”外交政策,充分运用和合算法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努力都充分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介入既成的国际体系和参与全球性行动,不会把既成的国际体系推倒重来,而是将担当起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大国责任。中国践行和合算法的努力有:在全球层面,提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等;在地区层面、双边层次也均提出了多种命运共同体的共建。

中国当下较全面展示和合算法的图景是“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

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以及与此相应的二十个重点合作方向。“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为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宣示了全球安全观，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国际无政府逻辑，完好地回答了安全指涉对象、安全立场、安全原则、安全治理的目标、主体、方式、内容等问题，完整地提出了维护与塑造全球安全的共建策略，即“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识，形成安全互助的良好态势，促成安全互保的战略环境，建成安全共享的治理体系”。

可见，关于人类安全算法“升级”的考察，对促进国际安全理论研究与推进人类安全进程意义非凡，特别是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彼此对冲的当下，何种安全算法的采用决定着国家安全道路的选择。而对人类来说安全算法的“升级”不

仅影响普遍安全的实现，而且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与最终走向。

## 五、结语

开展人类安全算法“升级”研究，有助于认清安全的本质，提高安全保障的水平，特别是有助于认清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安全形势的多维性、复杂性、不确定性。人类安全算法“升级”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安全问题应对和安全保障决策的普遍性特点，即不可仅有单一视角、单一时宜、单一手段，必须全面而发展地考量、综合施策。然而当我们在充分强调安全算法正向价值取向的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特别认真地考虑三点：

第一，认可人类安全算法的历史演进趋向，在现有历史语境中追求和合算法的价值目标，并不是无条件地放弃军事武力的运用。在现实中，国际社会四种安全算法的运用是“并存互构”与“不断迭代”的，正如迈克尔·霍华德强调“武力是国际关系无法逃避的一个要素，

这不是因为使用它的人生性好战，而是因为存在着使用它的可能性。武力因而必须被制止、被控制，最起码，也要被有区别有节制地运用”，但无条件地摒弃武力者最后将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任由掌握武力者摆布”。

第二，21世纪是算法世纪，算法将改变人类自身，但新的安全算法或许会带来新的“未知的不可知风险”，甚至可能引发更高层次或全新的“非传统战争”即更广义上的“算法战”。随着数据时代的发展，全球化转向“网”球化：一是“广义数据网”，“数字化”“符号化”为本质特征的“信息人”世界的形成；二是“广义生态网”，基于“生态化”“智能化”为生存特征的“智能体”或“超人类”社会的形成，而这两个“网”的形成与交织都是对“主权国家体系”藩篱的超越。随着人工智能算法广泛运用，算法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中具有驱动意义的要素。尤瓦尔·赫利利（Yuval Harari）为此在《未来简史》中甚至这样预言：“在21世纪，我们还会创造出比以往更强



大的虚构概念以及更极权的宗教。在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算法的协助下，这些宗教不但会控制我们每分每秒的存在，甚至将塑造我们的身体、大脑和心智，创造出完整的虚拟世界。”

第三，算法问题极其复杂，从后人类国际关系视角审视，人类安全算法的探究还需考虑未来的全新安全行为

体：基于生命的新物质体、基于物质的新生命体、基于智能的非生命体、基于与意识和感情关联的非人类行为体等，当这些新安全行为体均介入人类安全治理中时，以人类为中心的安全算法需要被迭代。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要通过更高维度的和合算法来促成“聚合”(Assemblages)式安全，人

类与非人类的异质性冲突，要有新的安全算法来消解，人类的最佳选择仍将是努力实现人类与人类自身、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和合共享。

编辑：王星懿

# 编辑团队



王星懿  
执行主编



许汶  
研究助理



尹金灿  
研究助理



杨佳琦  
校对编辑

#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本刊由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合出版，旨在跟踪观察非传统安全议题下的社会资讯、政策动向和学界研究，为从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提供时新、长久的信息渠道。

本出版物内容版权属于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转载、摘编请注明“来自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如因作品内容和版权问题需要同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系者，请于 30 日内进行。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  
大酒店 1803 室

联系电话：  
020-83870795